

【编者的话】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但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却未走进考场。自 2008 年高考考生达到 1050 万的峰值后这些年参加高考的人数逐年下降，今年的考生人数相较于 2008 年减少了 135 万。除去适龄人口自然减少的原因，选择放弃高考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这些学生为什么放弃高考？

根据熊丙奇教授的观察，农村考生在弃考学生中占重要比例。弃考的农村考生认为考大学的教育投入远不及回报。受教育阶段，教育资源集中在城镇，面对全国统一的高考，这样的现实增加了农村考生考入好学校的难度；大城市享有的高录取率也是农村学生求之不可得的。重重困难之下，农村考生若是考入了三本院校或是民办专科学校，就必须面对高昂的学费。原本抱有通过受高等教育而“跳农门”的一些农村学子，即便坚持到了高中，权衡之后还是放弃了高考。导致他们现实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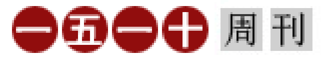
的重要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高考录取的机会不等。

另一些缺考的考生则选择出国，出于想接受不同的教育和看世界的心愿，也因为他们中的一些没有所在地户籍而无法在所在地高考。他们面临的选择是回原籍参加高考，焦等政策变化，或者出国。我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自命高考题，对于习惯了一地教育的考生，回原籍考试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因而他们选择出国。教育资源不公催生“高考移民”，与高考配套的严苛的户籍制度则带来了“新高考移民”。

考生的缺席源于高考制度自身的问题，记者刘金松在调查中发现，“高校招生分配名额失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教育部和高校之间利益交换的‘名利场’，而被高考决定着命运的考生，却没有任何发言权。”而译言网的文章则把目光投向了“新高考移民”遇到的困境，从高考制度下逃走的他们依然只是“为考试而学”。

对于高考如何改革的难题，许志永提出取消高考户籍制度的方案；杨东平教授引用罗尔斯《正义论》等有关正义和教育公平理论来比照中国当前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并呈现了建国以后中国在教育公平上的历史尝试。

高考呈现出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机会不等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引发了学者对于教育公平的讨论。张千帆总结比较世界各国的考试体系，招生方法以及各国“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办学方法；许纪霖由自身经历谈起，对恢复高考以来的国内教育体系提出了“人才至上，还是公正至上”的反思。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弃】

9-1 马晖：高校生源难题调查

“日前，一份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的高考报名人数约 900 万，较之 2008 年的 1050 万考生，4 年间锐减近 150 万人。高考中“三放弃”（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现象日趋普遍。与之相对，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 20％的增长率。”

2012 年高考逼近。

如果你是一个“高三党”，你考多少分现在不清楚，可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考，显然大局已定。

日前，一份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的高考报名人数约 900 万，较之 2008 年的 1050 万考生，4 年间锐减近 150 万人。高考中“三放弃”（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现象日趋普遍。与之相对，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 20％的增长率。

“班里有一些同学根本不打算参加国内高考，都已经考了 SAT，准备申请美国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高中的学生张熙说。

显然，家长和学生正在用脚投票，这使得国内高考生源危机更加凸显，尤其是处在整个高等教育金字塔底端的高职高专院校，招生情况不容乐观。“不排除未来几年，中国可能出现大学破产的情况。”有高等教育专家表示。

更有学者认为，危机的另一面，或可成为推进步履蹒跚的中国高校进行改革的“一大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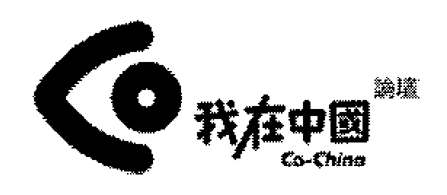
900 万考生

用盛极而衰来形容最近 4 年高考报名情况，毫不为过。

2008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1050 万人，此后开始逐年减少，1020 万、946 万、933 万……几成自由落体之势。

“2012 年，高考报名人数约 900 万人，四年累计下降人数已经达到 144 万。”《2012 中国教育在线高招调查报告》透露。

其中，作为高考大省，河南高考报名人数自 2008 年后逐年减少，2012 年仅有约 82.5 万考生报名，高考报名规模 4 年之间萎缩 16.5%，总减少 16 万人。





为何高考报名人数有如此巨大幅度的减少？

“报考人数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蒯鹏州博士表示。据其测算，2010－2020 年间是中国学龄人口加速下降的时期，其间，学龄人口总规模的年均降幅将达到 860 万人，平均每年将保持 3.23％的下降速度。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考生开始用脚来投票。

“现在，高考中的‘三放弃’现象，就是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的情况，越来越突出。”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同时，更多的考生和家长选择了出国读大学。

“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准备出国。听说其它几个学校还有专门的出国班。”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重点高中的张熙同学表示。

在谈到为何要出国读书时，这位高二的学生表示，“国内高校质量不行，很多师兄、师姐都告诉我，在国内上大学就是混四年后拿毕业证，毕业后紧接着‘待业’。”

其实，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知名的重点高中，每年高考的一本升学率能达到 70％以上，很多同学都考入北大、清华、人大这样的国内一流高校。

张熙的母亲就职于中央某部委，当问及为何要花更多的钱让孩子出国读书而不是上国内的名校时，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家长想法更明确：

从投入产出来看，国内现在高校的学费、生活费越来越高，一个学生四年读下来开销不小，而国内高校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找工作时还要再托人送礼。

“与其这样，不如让孩子直接去国外大学，拿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文凭，起码外语可以过关。”这位学生家长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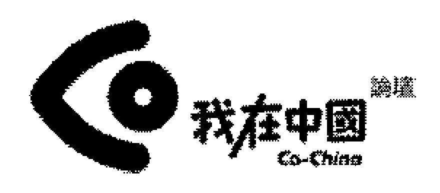
持有类似张熙母亲想法的中国父母，近年来人数越来越多。结果就是，这几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 20%以上的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这一群体将超 43 万人。

一方面是考生人数持续在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考生选择放弃国内高考进军国际，结果必然是国内高校的录取率逐年增加。

以上海为例，当地高考报名人数连年下降，2011 年报名人数仅 6.1 万左右，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不足 6 万。虽然上海一再压缩录取计划，但 2011 年高招实际录取率仍逼近 90%。

2012 年，上海高考报名人数仅 5.5 万，录取计划为 4.9 万，如果剔除掉部分不填报志愿、不参加考试的，今年上海很可能成为国内首个脱掉“高考落榜”帽子的省级行政区。

高职高专危机



高考报考人数的锐减，受冲击最大的当属那些数量庞大的高职高专院校。

去年高考结束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有 23 个省级区域的高招实际录取率已超过 78％，其中实际录取比例超过 85％的地区，已经达到 10 个，海南和吉林两省录取率则已超过 90％。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达到 40％。显然，未来几年国内高校的录取率还将有所提升。

据统计，2011 年全国各省市都存在没有完成录取计划的现象。

以另外一个全国高考大省山东省为例，专科分数线连年下降，2002 年专科二批分数线为 350 分，2003 年跌至 280 分；2007 年又下滑至文科 220 分，理科 210 分；2009 年文理科均为 210 分，2010 年文理科均为 190 分。到 2011 年，该分数线再次下调至 180 分。

去年该省二本一志愿缺额近 2 万个，967 所院校生源不满，几十所院校，遭遇零投档，最后高职出现了 4.2 万的生源缺口。

甚至有的省份，其高职高专院校的录取分数已经降至 150 分（满分 750），如果换算成百分制换算，成绩不过为 20 分。即便是这样低的录取成绩，该院校仍然无法完成既定的招生计划。还有很多学生在被录取后，不来报到。

“每年到了招生的时候，就是我最忙也最头疼的时候。”湖北一所高职院校的招办主任郁闷地表示。

这是一所模具制造领域的高职院校，开设有近 20 个专业，每年计划招生 3200 名，“实际能招到的连 2000 人也不到，就这个数还是我想尽各种办法凑起来的。”

有的高职高专院校为了抢生源，甚至会组织预报名该校的考生去免费旅游，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留住考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高职高专院校生源不足的问题，有很多省份教育主管部门尝试改革此类学校的招生规则。

去年 8 月，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宣布，在全国率先实行注册入学，省内专二批次的 26 所高职院校不设统一省控线，由校方自行设定录取要求，一档多投，学生、学校实行双向选择。

但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仍有大批高职高专院校无法按计划完成当年的招生。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当前的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及质量很难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很多学生选择复读或是直接去打工。

“长此以往，这些学校的生存堪忧，不排除未来几年，中国可能出现大学破产的情况。”有高等教育专家表示。



不过，更有有识者在危机中看到了下一步改革的契机。

“未来十年间我国高校将面临破产关门的危机，中国的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建议自由转学制度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满足考生对高等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大学的竞争力。”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马晖，《21 世纪经济报》记者。原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链接 http://www.21cbh.com/HTML/2012-6-4/2OMDY5XzQ0Njg2OQ.html）

【返回目录】





9-2 熊丙奇：如何理解农村考生放弃高考

"这就出现了农村学生弃考和不发达地区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困境——在权衡上学的学费投入(上民办的高职高专和三本学费大致是公办院校的两倍)、接受教育的回报（没有人脉关系加之三本、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不高、找到的工作待遇与农民工相差不多）之后，一些农村家庭学生主动弃考，认为这还不如直接打工合算。"



2009 年全国 84 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 年 946 万应届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 100 万，除了 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人民日报》8 月 28 日）

就在两天前，一位记者请我谈谈对发达地区高职招生情况比较理想，而不发达地区高职高专院校却面临很严重的招生困境的看法。他对这一现象不理解，按理，不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孩子应该选择上大学这条道路，当地高职高专不至于招不到学生。

他的这一想法，放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8%不到，高等教育包括大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考上一所大专院校，农村学生也实现了"跳农门"的理想。然而，过去 10 多年时间中，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到 2010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 300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6.2%,每年毕业大学生人数达到 700 万，与之对应，高等教育的质量却存在下滑趋势，高校对学生的回报率日益降低。对于农村学生来说，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是，考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但考上的大学主要是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而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就业情况都不理想。

这就出现了农村学生弃考和不发达地区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困境——在权衡上学的学费投入(上民办的高职高专和三本学费大致是公办院校的两倍)、接受教育的回报（没有人脉关系加之三本、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不高、找到的工作待遇与农民工相差不多）之后，一些农村家庭学生主动弃考，认为这还不如直接打工合算。事实上，熬到高考才弃考的学生，已经很有耐心了，还有不



少学生在中考时就弃考，甚至在初二时就辍学。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中西部地区蔓延。

而在城市，选择上高职高专的家庭的情况却不同。一般来说，目前发达地区、大城市的本科录取率已经很高，北京和上海都达到 60%左右，在如此高的录取率之下，某个学生却不能上本科，主要是实力使然，对于这些学生，家庭要么让其出国，要么则让其上高职高专，而不会让其直接参加工作。也就是说，对于城市人家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的迫切性要低于农村家庭学生。

由上述分析，不难得到该怎样面对农村学生弃考现象。首先，必须提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尤其是目前处于较低层次的三本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回报率。最近舆论热议“寒门难出贵子”，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能够上一本院校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如果认为只有考上一本才有出路，那么，很多学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教育部门必须破除造成院校不平等竞争的教育制度，同时给予高校办学自主权，让每所学校办出特色。不然，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名校，整个社会名校情结严重，学生成才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狭窄。

其次，应改革包括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消除高等教育所承担的非教育功能。一直以来，我们都说“教育改变命运”，“高考改变命运”，这种说法表明，每个人的命运是生而不平等的，而教育扮演着改变每个人社会地位、所获福利待遇的角色。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不同的高职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教育学者。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dsoy.html）

【返回目录】



9-3 谢良兵：新高考移民

“类似冉豆这样因户籍限制而放弃高考出国的借读生，在北京的出国留学高中生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本报记者咨询的北京多家以出国为目的的私立国际学校高中部或公立重点高中的国际班，这样的外地借读生大概占三分之一。”

6 月 7 日，国内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开始。比同学们幸运的是，5 月初，就读于人大附中的冉豆就已拿到美国一所排名前 46 位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考场中紧张的同学和考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这一中国高考的经典场面与他无关。

冉豆从去年 9 月就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这一申请在今年的 1 月份结束。这个学期，他需要做的只是等待大洋彼岸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而在他的班上，空座位在逐渐增多，许多高中毕业生也选择了出国留学。在人大附中国际班的近百名高三学生，至少 60%的学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很多人已提前开始了高中的“毕业之旅”。

与以往国内为了追求更高升学率的跨省“高考移民”不同，现在许多家境中等以上的高中生将目光转向了国外，被称为“新高考移民”。

放弃高考

冉豆的妈妈王雪妮是东北人，和丈夫来京工作十多年。丈夫经营一家企业，而她则在一家事业单位。但与大多数来京务工人员一样，两人均未能获得北京户口。冉豆是小学三年级随父母来北京读书。因为各种原因，中间换了好几个学校，最后去了一家不错的学校，学费稍微贵点，但好在没有户口限制。2008 年中考的时候，冉豆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市著名的重点中学人大附中读高中。

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冉豆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王雪妮说，当时一家人商量，想到的出路有三条：一是回老家；二是继续等待政策；三是出国。经过再三考虑，最终选择了出国这条路。

类似冉豆这样因户籍限制而放弃高考出国的借读生，在北京的出国留学高中生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本报记者咨询的北京多家以出国为目的的私立国际学校高中部或公立重点高中的国际班，

这样的外地借读生大概占三分之一。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高三学生选择了放弃高考。尽管 2011 年的最终报考数据尚未公布，但已有媒体根据各地统计的数据得出：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 30 多万。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接近 100 万人。

而根据教育部更早前的数据，2009 年全国 750 万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有 84 万最终放弃高考，其中因出国留学而弃考者高达 21.1%。因此，高考弃考学生大多数还是农村学生。按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分析，除了与出生人口有关的"自然减员"外，国内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大学生薪水不及农民工等也是导致高考弃考学生增多的原因。在一些农村，"读书无用论"思潮再次抬头。

熊丙奇说，从对放弃高考的农村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放弃高考并非有多种选择放在学生面前，而是充满了无奈：上大学前途渺茫，不上大学前途也渺茫，弃考的学生可选择的，大多只有一条以农民工身份进城打工的道路。

渐成风潮

在城市高考弃考学生中，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新浪—中留服—麦可思高中生出国留学跟踪调查"显示，从 2010 年 9 月 19 日到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有出国意向的被调查高中生中，70%计划高中毕业后出国读大学。

而另一项根据中国教育网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从 1978 年到 2010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190.54 万人，出国留学人数年均增长 25.8%，出国留学规模扩大了 313 倍，其中最多选择出国留学的是高中毕业生。

在大中城市，公立的重点高中办国际班的比例在逐年增加，还有不少私立学校直接打着国际学校的旗号，称与美国、加拿大等联合办班。在北京，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首师大附中、北京四中等重点高中均办有以出国为目的的国际班。

据了解，这些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比普通班的录取线通常要低三四十分，但英语成绩要求很高，而且费用不菲，据了解，北京一般的国际班每年学费在 8~14 万之间。尽管如此，对国际班的趋之若鹜也让校方招架不住，不得不控制人数。

在这些弃考出国的学生中，除了像冉豆这样的外地借读生，另一部分放弃高考出国留学的多为成绩能上国内名校但上北大清华等有些难度的本地学生。

张女士的孩子是北京户口，已经出国两年。回想当初让孩子高中毕业就出国读书的原因，张女士称，国内的大学是严进宽出，而国外正好相反。她希望孩子能更有创造力些，这些方面，国外的大学显然做得比国内大学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如果在北京参加高考，竞争太激烈，依照他的成绩，上一流大学不成问题，“可是想上清华北大，还需要更努力，但我不想让他压力太大。”张女士说，看着孩子从小就拖着个大书包去上学，就是一种折磨。

其实还有一个张女士未能明说的原因是，她周边的同事和朋友很多都将孩子送去了国外。根据一些留学咨询机构的介绍，以往高中毕业出国的多为学习成绩不好，在国内考大学无望，家庭条件富裕的。而如今，学习成绩很优异，家境很普通的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高中出国已经成为一种“风潮”。

按照熊丙奇的分析，国外大学近年和国内大学的招生竞争也让国内的高中生多了一个选择。弃考出国潮起，“与升学教育模式呆板、多元成才途径匮乏、选才用人制度僵化多有关联。”熊丙奇说。

计算投资收益

一个高中生出国留学的成本有多高？王雪妮说，考托、考 SAT（美国高考）等成本都不低。去香港考试来回的花销也在两三万不止。申请期间还需要 40~60 万元的资金作为资信证明。“留学整个下来没有 120 万是不行的。”王雪妮说。

申请奖学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王雪妮说，很多美国大学在听到他们想申请奖学金时，就不再有任何消息。出国留学也并非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的。王雪妮说幸运的是，她 2002 年花三四十万在丰台区买了套房子，如今价值百万以上，准备孩子留学费用不够时卖了房子。

事实上，比起在国内读大学的成本来算，出国费用尽管不菲，但也并非一笔烂投资。王雪妮说，要是冉豆回家高考，在当地的高考压力下，必须花钱进一所很好的高中，而三年的家庭分居生活万一发生“家变”，更是得不偿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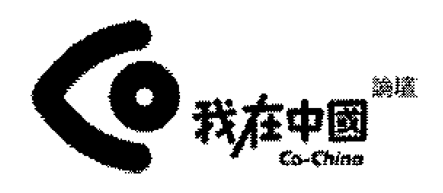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如果留学结束需要回国，王雪妮也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的落户政策中，归国留学生相对国内大学毕业生要容易得多得多。对于绝大多数在北京的外地人来说，仅北京户口一项成本，留学归来若能落户就已是“值回票价”。

在那些北京本地高中生选择出国的考量中，尽管现在“海归”已不如多年前吃香，但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日子更加艰难。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2008 年毕业的大学生当年 30%以上没有找到工作，已找到工作的人平均起薪是每月大约 1500 元。

相比国内大学毕业生，“海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和薪水也都不在一个平台上。在本报记者接触的留学归来的就业者中，月薪基本都在 4000 元以上。这个薪水比起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已属不错。

专注于移民留学咨询的新嘉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析称，以 2010 年底的数据来算，按每年每个留学生平均花费 10 万元人民币来计算，共 127 万的留学生每年总花费约 1270 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财富外流方面，留学潮比移民潮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出国留学后的前途，家长们暂时也大多未做太多的想法。“我希望他能读完硕士，到时候是不是就留在美国了，或者还是回国发展，都看孩子自己吧。”王雪妮说。而在第三方的调查中，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就有不少人选择了“工作和移民容易”。



（谢良兵，《经济观察报》记者。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2011/0607/203098.shtml）

【返回目录】

【困】

9-4 刘金松：高考招生“名利场”



“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 1%。换个角度理解，北大对广东、安徽学生设置的门槛比北京考生整整高了 100 倍。而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 53 倍，山东考生的 274 倍，内蒙古考生的 288 倍。高校招生分配名额失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教育部和高校之间利益交换的“名利场”，而被高考决定着命运的考生，却没有任何发言权。”

一名高三学生，在不同省份，考上名校的几率差别有多大？答案是：最大差别 288 倍。

高校招生分配名额失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教育部和高校之间利益交换的“名利场”，而被高考决定着命运的考生，却没有任何发言权。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研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中得出的结论，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 1%。换个角度理解，北大对广东、安徽学生设置的门槛比北京考生整整高了 100 倍。而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 53 倍，山东考生的 274 倍，内蒙古考生的 288 倍。

5 月 23 日，包括张千帆在内，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单位的 15 位学者上书国务院、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

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中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制，经过多年演变，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并成为高等教育公平改革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产物，配额制已在中国大多数领域被打破，但在高校招生中，囿于各种利益纠葛，配额制所带来的不均衡现象，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沦为各种利益交换的名利场。

两年前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

督，公开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依然处于黑箱之中。

失衡背后的地域歧视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将在本周拉开序幕。参加 2012 年普通高考的考生预计在 900 万人左右，与 2008 年高峰时的 1040 万报考人数相比，全国考生减少了约 140 万人。

考生总数下降的同时，高校的扩招步伐并没有停止。从 2008 年的 600 万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675 万人，今年预计将达到 695 万人。一减一增之下，高考录取比例也将从 2008 年的 57%，提高到 2012 年的 75%以上。

从分省录取情况来看，不仅北京、上海实现了 86%、89.3%的较高录取率，即便是安徽、河南等省份的录取率也都超过了 70%，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录取率更是超过了北京，达 87%。

逐渐拉平的整体高考录取率背后，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也在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重点高校名额区域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更加凸显。

以北京大学为例，根据 2011 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 1.27，广东为 1.4，贵州为 1.48，河南为 1.87，北京为 52.5。

安徽每 7826 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 190 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 41 倍，是广东考生的 37.5 倍，是贵州考生的 35.4 倍，是河南考生的 28 倍……

“北大的招生方案还不是最糟糕的，和复旦、浙大、南京大学等京外高校相比，可以算是相对最不歧视的‘楷模’”。张千帆在其课题报告中总结说。

以 2009 年的招生为例，复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 117.1 名，在浙江则是 5.2 名，在北京 4.2 名，全国平均 2.2 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内蒙古等 10 个省区投放的招生指标都在 1 名以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 53 倍，山东考生的 274 倍，内蒙古考生的 288 倍。

分居京沪的两所重点高校录取失衡状况，只是重点高校在全国录取名额失衡的一个样本。根

据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艳玲提供的数据，目前，河南本科层次的录取率不足 34%，一本院校录取率不到 5%，能够上“985”、“211”院校的学生不到 2%。这与高等教育发达地区相比，差距非常大。2011 年，京、沪的本科录取率已分别达到 55.8%、66.7%，一本录取率为 24.4%、19.6%。

张千帆认为，重点高校分布不均及高校招生中普通的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目前区域失衡的主要原因。以“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为例，在正式公布的 39 所“985”高校中，北京独占 8 所，上海 4 所，浙江、重庆、安徽、吉林等六省市分别有 1 所，河北、河南、山西等 13 个省区“985”高校数为零。“211”工程大学的分布存在同样失衡状态。

在张千帆看来，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成比例的集中在大城市，高校招生地域歧视的后果就显而易见，农村考生在高校尤其是知名高校的比例连年滑坡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花钱买公平

改变目前高校名额分配的不均现象，已有学者提出诸多建议，包括全国统一考试、分数面前一律平等，也有建议取消户籍限制，按注册学籍平均分配招生名额。

不过，这些带有根本性变革性质的建议，只是处于学者的理论探讨层面。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的措施更多是对目前格局的宏观调控：比如规定部属高校在所在地的招生不得超过 30%，要求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倾斜……但在高校掌握名额分配权的背景下，教育部的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目前高校招生失衡的现状。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潘昆峰曾对“央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原则”进行过专题研究，经过建模分析后发现，上一年度名额分配对本年度名额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决定系数高达 98.4%。“如果往年的招生名额分配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反之亦然。

但在张千帆看来，高校在招生计划分配上，随意性比较强，极易产生幕后交易和教育领域的腐败。

媒体报道的一则极端案例是，北京某知名大学招生人员到地方“点招”一考生，因该考生不符合提档要求被当地招办拒绝，此后该大学几年都没有安排在该地招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认为，目前部属大学招生名额分配主要体现了三方意志：高校、高校所在地政府、教育部。高校所在地政府非常希望部属大学都能成为当地的大

学，招收当地学生越多越好。

教育部则把部属高校参与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看成是部属高校最重的使命。而且，一个部属高校如果能够更好地为当地服务，教育部也会觉得自己脸上非常有光彩，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交易当中也是很得分的。因此教育部虽然提出要限制部属高校在所在地的招生，但没有真正地下力气去做。

对夹在两者中间的大学来说，也没有动力去改变目前的招生格局，既然当地政府也满意，教育部也满意，高校就更不愿意去得罪人，而且还能够从招生当中获得利益，何乐而不为。

以南京大学为例，这所直属教育部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在 1999 年进入国家“985”工程。2006 年教育部和江苏省签署重点共建南京大学协议，5 年内各自投入 7 亿元专项经费，支持南大发展。正在实施的“211”1-3 期建设中，江苏省按照教育部专项投入 1:1 的比例配套。不过，协议中也明确规定，南京大学要增加对江苏本地的招生。

曲相霏认为，高校、高校所在地政府、教育部三方的利益决定了目前高校招生指标的分配格局。最重要的一方——考生，却没有参与到博弈中来。

据接近教育部的知情人士透露，在目前利益格局难以调整的背景下，教育部计划采取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导高校招生名额的投向。即高校凡增加一个在教育部指定省份的新增名额，将可获得一定的经费补贴。不过这一说法，尚未得到教育部确认。

争抢指标

教育部更给力的措施出台之前，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行动。尤其是随着高校扩招放缓，在国家严格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稀缺省份只能各显神通，争取在现有的招生名额内重新分配。

今年 3 月，全国两会结束后，河南副省长徐济超就曾带队到北京推荐生源，希望在京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能扩大在河南省的招生规模。这也是自 2006 年起，河南省政府第六次率队进京推介河南生源。

除北京外，河南教育厅、河南省招办还兵分多路，赶赴上海、天津、南京、西安、武汉等中国高校集中的地方，与 160 多所高校及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沟通，期待能在招生名额分配中，

给河南更多支持。

2008 年开始，安徽省教育厅也由厅长带队，多次跑教育部要指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组团到天津、上海争取招生计划，并与北京、辽宁、浙江等部分生源下降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所属高校进行沟通，积极争取更多的招生名额。

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2012 年教育的十二大惠民新政”中，即包含为安徽考生争取在皖招生计划，“重点争取本科特别是一本批次招生机会”。

刘海峰认为，不单是这两个省，其他一些省，或多或少的都会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但对目前的招生格局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他们更担心的是这种“跑部钱进”式的指标争抢可能引发的腐败，“谁去跑，谁会哭，谁就有奶吃，说白了不就是腐败吗？”

（刘金松，《经济观察报》记者。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602/227614.shtml）

【返回目录】



9-5 译言网：中国学生之困

“那些已经开始行动的大学有着深深的忧虑：美国大学在还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就贸然走入了中国市场。不久之前，一家美国大学的教务长联系了 Zinch 中国的 Tom Melcher，说要招收 250 名中国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时，教务长说他们学校今年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他说，为了填补这一赤字，他们得额外招收一些付得起学费的学生，而中国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学年伊始，成批的新生涌入 Delaware 大学学生中心的大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穿着时髦的磨损牛仔裤和鲜艳的运动鞋。一半人安静地按着手机，剩下的人则在热切交谈。可是，对于一个普通话不怎么好的人来说，偷听这些谈话可是件难事，因为他们中除了一位哥伦比亚学生看起来失魂落魄以外，其他人都来自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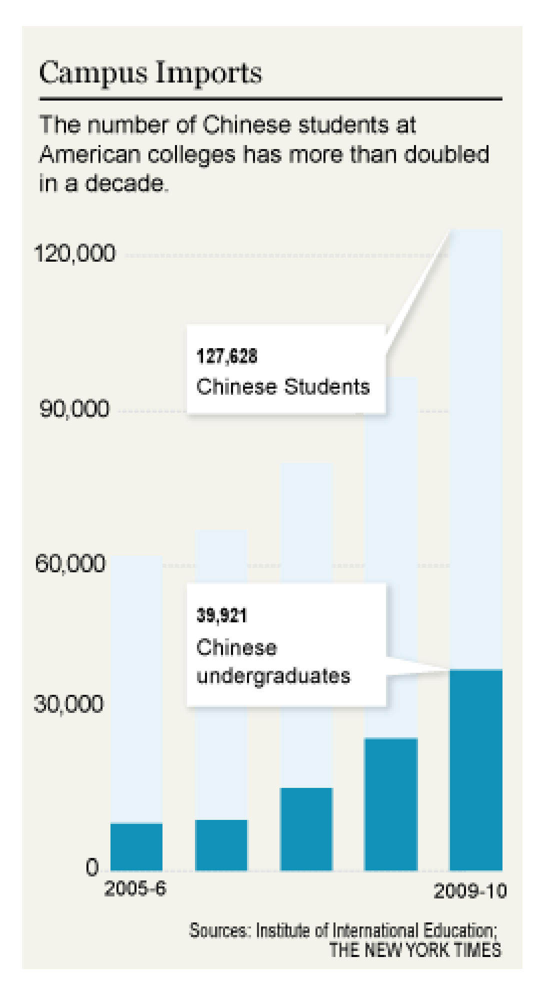
六小时前刚从上海飞到这里的 Fan Yisu 也是其中之一。为了等着去英语学校报到，他兴奋得一夜没合眼。和大部分在 Delaware 的中国学生一样，Fan 也被学校“双录取”（译者注：在中文语境下，“双录取”特指美加大学的有条件录取），也就是说，他得在开始大学课程之前完成英语学业。他打算主修金融，毕业后回到家乡，为他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他带着时髦的黑框眼镜，脖子上挂着中国龙的护身符。Fan 说，他选择在离家 7 000 英里的大学读书，是因为“他们美国人的教育非常好”（译者注：原文为“The Americans their education is very good”，这并非合乎语法的英文表达）。

这一观点在中国广为流传。它可能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赴美留学的中国本科生的数量在过去的三年内增长了两倍，达到了 40000 人。这也使中国人成为美国大学中数量最多的外国面孔。尽管韩国、印度这些国家多年以来向美国输送了大批本科生，中国学生的突然增加还是激起了美国大学的惊讶与震动，而其中一些提供英语学习项目的较大的公立大学尤其欢迎国际学生。比如说在 Delaware 大学，中国学生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8 人，激增到今年的 517 人。

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于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有能力付清全额学费。这可是大学们近年面临大额预算削减时的天赐之物。这看起来好像对大学和学生都有好处，但如果仔细观察却会

发现，对二者来说，这种情况都非常棘手。

大学普遍希望让他们的学生群体更加丰富，让他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强大，所以他们匆忙冲向中国开始招生。在中国，学生们为了进入中国大学，要面临激烈的竞争，而繁荣的留学中介业务很好地满足了学生和家长们走入美国大学的热情。大学的官员和顾问们说，他们注意到了申请中的大量造假情况：中介代替学生捏造个人陈述文章，或是学生的英语成绩，与实际英语能力不符。在新兴的中国市场面前，美国大学正艰难地努力区分那些优秀得不真实的申请者和那些真正优秀的申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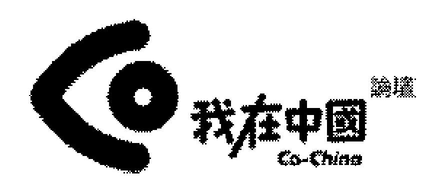


进入课堂，英语比较差的学生会努力跟上讨论的节奏。尽管他们优秀、刻苦，和美国的同伴们也很相似，但像美国学生一样，他们也常常失败。部分教授说，他们不得不改变教学方法。

大学缓慢地适应他们遇到的挑战，但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适应，也为了解决申请中遇到的问题，他们正在尝试新的策略。“责任在学校，”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国际部主任 Jiang Xueqin 说，“美国大学不高兴？因为中国学生和家长不高兴。”（请参阅 Jiang 在 Chronicle.com 发表的英文评论或译言网友 RackyLo 的翻译版）“如果美国大学不把他们本来需要解释的问题向学生和家长们解释清楚，什么都不会改变。” Jiang 说。

中介的角色

Tang Wenting 是个爱笑的女孩。她常听 Red Jumpsuit Apparatus 和 OK Go 这样劲爆的摇滚，在她的 Facebook 页面上描述自己“非常有趣”又“非常认真”。 Tang 现在上大三，主修管理和国际贸易。她的英语非常好，虽然不一定能算是完美无缺，但至少也让她十分自信。事情一开始并不如此。她自己估计，当她申请 Delaware 大学的时候，她的英语非常差。



Tang 是在上海念的高中。她本来并没有决定选择 Delaware 大学这所有着 21000 位学生、录取率大约一半、有着副总统 Joseph R. Biden Jr. 等杰出校友的公立大学。Tang 的母亲想让她去美国读大学，所以她们调查了几十家留学中介，耐心地听着他们的保证和曾经的成功案例。

母亲选了一家中介，这家中介建议 Tang 申请 Delaware 大学，并帮她填好了申请，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提供了相当多的指导。要是没了这家中介，申请过程会非常的混乱。Tang 的英语并不好，她没法写申请文章，所以中介的员工收了她 4000 美元，用中文问了她很多关于她自己的问题，然后写出了一篇文章。她还在中介准备考试，这又花掉了她 3300 美元。

现在她自己可以用英语写作，但她并不觉得当时中介员工写的文章有多好。但那篇文章成功地将她送入了 Delaware 大学，并让她在开始大学课程之前上了六个月的英语课程。尽管过程一波三折，她的成绩并不错，而且很享受大学的生活。至于让留学中介代替她写文章的决定，她认为这非常实际："我当时英语还不如现在更好"（译者注：原文为"At that time my English not better as now." 这里故意写出语法错误，以符合作者英文原意。）

据 Iowa 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们发表在 *Journal of College Admission* 上的研究结果显示，很多进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求助于中介指导他们的申请过程。

留学中介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帮助中国学生申请的工作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那时美元在中国还是禁止使用的，只有中介可以保证支付学费的安全。招生专家们说，他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指导学生进行看起来非常陌生的申请过程，其中的申请材料经常只用英文打印。中国学生常常为课外活动在申请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困扰，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写过个人陈述文章。在一个没几所学校设置升学指导的国家，"向升学指导索取推荐信"听起来也十分荒谬。而且，非常多的人认为 *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大学排名是政府官方发布的。

虽然中国肯定有不少光明正大的留学中介和毫无水分的申请材料，还有不少中介却常常欺诈。北京一位高中领导说，中介伪造她所在学校的信纸抬头，用来打印虚假的成绩单和推荐信。有一次一位家长打电话给她，抱怨说中介向学校索取材料还要收费，她才发现这一点。Kansas 州立大学的国际招生部主管 James E. Lewis 说，他曾经收到过明显来自同一家中介的一大堆申请，因为虽然学生来自相距很远的城市，申请费却是同一家银行的户头交的。他们的五张成绩单当中，有三张是完全相同的。



Zinch 中国是一家咨询公司，向美国大学提供关于中国的咨询服务。它调查了 250 位来自北京，准备赴美留学的高中生、他们的家长，以及很多中介和招生顾问，并于去年发布了调查报告。Zinch 总结道，90% 的中国申请者提交了虚假的推荐信，70% 由他人代写个人陈述文章，50% 伪造了高中成绩单，10% 还伪造了学术奖项和其他成绩。报告中称，这一“申请造假的大潮”，可能随着申请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为考试而学

Zinch 中国区主席、报告作者 Tom Melcher 说，如果仅仅是批评提供这些服务的中介，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说，这些中介提供服务，是迎合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几乎都没有兄弟姐妹，而他们那些新近才变得富裕的父母要为他们的成功投下血本。很可能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是如此。Aoji 教育集团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大型的咨询机构，它提供的“保证录取”服务非常著名：申请五所大学，而如果所有学校都没有录取学生，学生就可以获得退款。“如果学生被拒绝了，家长们就会在大厅里哭天喊地、大呼小叫，”在位于北京的 Aoji 美国申请部门工作的 Kathryn Ohehir 说，“他们不要退款，一心只想他们的孩子进入常青藤盟校。”

在中国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环境下，学生在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准备高考上面。高考是决定学生是否可以在僧多粥少的中国大学争夺战中抢夺先机的唯一因素，所以那些准备赴美留学的学生花数月的时间准备大部分美国大学要求的 SAT、TOEFL（托福）考试，也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Iowa 州立大学的招生助理 Patricia J. Parker 录取了超过 1200 名中国本科生。她说，学生骄傲地跟她炫耀他们如何记住上千个单词，如何研究在英文题目（译者注：Verbal questions，不知道怎么翻译好）中套用模板，以及如何走通帮助他们猜对答案的捷径。她注意到，获得双录取的学生们大多可以在暑假过后提高 30 到 40 分的 TOEFL 成绩，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并不见长。她还说，他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这样紧张的考试准备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最终目标是通过测试：他们为了测试而学习，这不是学英语。”

Parker 估计，她在申请季内，几乎每两天就会联系一次 ETS（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这家负责 TOEFL 考试的非营利机构，以调查可疑的成绩。和很多教育家一样，她也希望 TOEFL 考试能有些

变化，让通过考试更加困难。

而今年秋天，在 Kansas 州立大学，几位中国学生出现在课堂上，但他们的长相和早前他们参加 TOEFL 测试时拍摄的照片并不相符。ETS 说，它采取了额外的措施，例如收集考生的笔迹，以降低考生雇佣替考者，让他们中途混进来的可能性。如果考生被发现作弊，ETS 会取消考生的成绩，但这家机构并不说明到底在哪里考试的多少人的成绩被取消了。Kansas 州立大学和 ETS 一样，也不会评价他们的惩罚措施，但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应对虚假 TOEFL 成绩的政策。国际招生部主管 Lewis 说，坐在桌子前判断什么是欺诈行为，可是一件困难的事。

原创与权威

在 Delaware 大学 Newark 校区刚刚结束的九月份报到日上，英语学校的主管 Scott Stevens 面前是几乎满座的剧院，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着两位白人学生坐在桌前的照片。照片里的男学生俯身偷瞄女学生的试卷。Stevens 告诉主要为中国学生的观众们，“我们有独创的能力，我们决不抄袭！” 他一边赞扬，一边警告：“你们都很聪明，要把这种聪明劲用在创作自己的论文上。”

Stevens 自 1982 年以来就在这家英语学校工作。他们的课程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扩张，教室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大楼，走到了校园内薄饼连锁店的身后。看看 Stevens 一天的工作，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他的活从来都干不完，一天到头忙忙碌碌；还能同样明显地看出，他很为自己广受好评的学校感到骄傲，也十分在乎他的学生们。他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跟学生们说他们只要有需要，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就算在半夜也不例外。

但面对 Delaware 面前，中国学生人数从几人到上百人的增长带来的挑战，他的看法十分客观。这些挑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剽窃行为。Stevens 还记得，他的一位学生背熟了四条维基百科（Wikipedia）词条，以便套用誊写在课堂作文中。这可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这些学生的祖国鄙视个人主义，美国的知识产权概念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他们接受的。（Stevens 说，在语言课程中，正式的违纪行为并没有激增，因为老师们更喜欢在课上就解决剽窃的问题。）

正如原创性的概念和文化息息相关一样，权威的概念也和文化交织在一起。Stevens 说，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和文化，还和政治因素有关。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在政府的宣传下长大，而在这些宣传中，美国的形象似乎并不怎么好。如果你生命中的前 18 年都处于这种环境

中，问题就来了：当问到他们相信谁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同胞。他们尤其不信任我们。

Stevens 还说，一些新生并不与随机选出的美国学生同住，而是付了住宿费，却在校外租房子住，这可是违反校规的行为。而且他们还不怎么参加学校的资源活动。在今年夏天的一个聚会上，有来自 40 个国家的将近 400 名学生出席，但其中只有大约 10 人来自中国。他们还常常调课，为了和自己的同胞在一块，而不管他们的指导员帮他们安排好的课程。

Jennifer Gregan-Paxton 就是其中的一位指导员。Gregan-Paxton 是商学院本科学生指导办公室的协调员。她说，她惊讶于中国学生的职业道德与彬彬有礼。他们经常向她和教授送一些小礼物，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最近，她曾在一天之内受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条丝巾。看到这些学生总想呆在一块，她并不感到吃惊。“也有一些中国学生想脱离他们的大部队，但这些特立独行的学生不怎么受其他人的欢迎。”

比如说贸易专业的 Tang。她回忆起她曾经上过的一堂课，在课上教授故意忽略她的问题，只听美国学生的。而在社会学课上的团队项目中，她被冷落了。“他们假装很欢迎你，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一遭遇使她郁闷了很久。她说，“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件事。”

去年秋天，Kent E. St. Pierre 教授一门 35 名学生的中级精算课程，其中的 17 人都来自中国。几周之内，除了 3 个人以外，其他所有非中国学生全部退掉了这门课。为什么美国人都跑了？“他们说，课堂太安静了，” St. Pierre 回忆道。他认为自己身上有着上世纪 60 年代的自由主义气息，说自己是为了学校多样性着想。但他也同意，“这相当致命。”在许多亚洲学校里，大量的课堂讨论相当反常。正如 St. Pierre 指出的那样，如果把美国人放到中国课堂上，他们无疑就像话痨一样。

成绩的难题

尽管他们有着特别的学习方法，在 Delaware 的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和其他本科生的都差不多。这一现象可能可以部分说明，中国人很强的数理能力让他们在大量需要数学的课程中取得好成绩。比如说中国学生最热衷的商学和工程学专业，就大量需要数学，而不怎么需要英语能力。当然，一部分中国本科生确实能力相当突出，可以在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中站稳脚跟：Harvard 大学在 2010-11 学年就招收了大约 40 名这样的学生。

但一些教授说，他们很大地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法，去适应这些数学好、英语差的中国学



生。在考试时， St. Pierre 现在要求所有人把书放到教室前面，以防止作弊。他在 Delaware 任教 20 年，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方法。另外，课堂参与占分数的比例更小了，这样可以让外国学生的分数不那么低。过去每个学期他都要求学生们做 2-3 次的课堂演讲和展示，但现在他只让他们做一次。“一些美国学生说，他们听不懂这些演讲在讲什么，”他说，“真让人痛苦。”

经济学和金融教授 Robert Schweitzer 却觉得一些最基本的单词很令人头疼。“有学生跟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升序的’。他们做错题到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课程内容，还是因为他们看不懂题目？”教授努力理解学生的意思，反之亦然。

Ma Damon 在参与语言学校的“桥梁计划”，这说明他的英语很好，能够让他参加正常课程，虽然他并未完成英语学习。 Ma 非常热衷于在美国学习，这一梦想深深根植于他的少年时期。而且他对两国学术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什么都在抄，”他说，“他们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写一篇 25 页的论文，然后拿 A。”

他在上他第一堂大学课程的时候相当紧张。那是一节介绍中国古代历史的课程，而在学期开始几周之后，他还在奋力与语言障碍搏斗。“我大概能理解 70%，但我搞不清楚细节和单词。”他说。

许多来到 Delaware 的学生本想只上几个月的英语课程，但他们最终都在英语学校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每两个月就得花掉 2850 美元。Chuck Xu 和 Edison Ding 已经在 Delaware 的英语学校里花了一年的时间了。他们的英语水平最多也就能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而且他们和记者的交流十分费劲。Ding 说他向中介付了大约 3000 美元，帮助他准备标准化考试、填写申请材料、用英语写好个人陈述文章。Ding 已经想不起来那篇文章讲了什么了。

Xu 刚刚结束他的英语课程，进入了大学新生的课堂。Ding 还有最后一关要过，他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在春天开始。

大约有 5% 的学生在大学课程开始之前就退学了。Delaware 中国学生会前任主席 Zhang Chengkun 认识不少学生，他们沮丧地离开这里回家。“不少学生都向我抱怨过，他们觉得英语课程除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扒出钱来，并没做什么其他事情。”他说。

目标是中国

大学吸引更多外国学生的努力是“卓越之路”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由 Delaware 的校长 Patrick T. Harker 制定。当他五年前来到 Delaware 时，只有不到 1% 的学生来自其他国家。对于外国学生在课堂上面临的挑战，他有着第一手的经验：他每年都会教一门大一课程。“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学生，只是在美国文化和美国俗语方面饱经挫折。”他说。Harker 注意到，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并不总和他们申请中看上去的样子一致，尽管他提到这一问题困扰着很多大学，不仅仅是 Delaware。

但他否认了“大学在中国招生主要是为了经济上的考虑”这种说法。“来自 New Jersey 州的学生一样要付钱，”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真的只跟多样性相关。”

Delaware 的国际学生集体主要还是来自与中国。招生主管 Louis L. Hirsh 说，他正在努力改变这一不平衡的局面。他说，Delaware 正在努力开拓中东和南美洲的道路。

但是对于想走国际化道路的大学来说，招生计划自然要努力在中国展开。

当 Oklahoma 基督教大学决定展开国际招生计划时，它雇佣了三名招生官，把他们派到了中国。“我们决定专注于中国市场，”国际课程主管 John Osborne 说，“因为它真的很大。”这所大学于 2007 年招收了第一位外国学生，而时至今日，它已有了 250 名外国学生，其中四分之一都来自中国。

确实，如果大学打开大门，希望不停招收中国学生，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Ohio 州立大学今年收到了将近 2900 封来自中国的申请，而 Mount Holyoke 学院已经可以通过仅招收中国学生满足招生计划。今年秋天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外国大学展览会吸引了 30000 人参加。

市场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其中行走都很困难。一些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早已建立了联系，有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生输送，然而大部分的美国大学和中国的高中并没有什么紧密的关系。如果只有很少的精英学生出国留学，大学只要简单地瞄准最好的高中就可以了；但招生官们现在可能必须得熟悉上千所学校，才能找到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一位每年只拜访中国 1-2 次的招生官来说，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包括 Delaware 在内的一些大学已经雇佣了海外代理。这种做法在国内招生中是被禁止的，但它今年成为了全国大学招生顾问协会辩论的核心。尽管这些代理作为大学的代表，帮助大学在招生展览会上摆摊宣传、争取申请，但大学还是没法知道申请到底是学生还是中介填写的，也没法

知道学生的成绩和分数是否真实。

那些已经开始行动的大学有着深深的忧虑：美国大学在还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就贸然走入了中国市场。

不久之前，一家美国大学的教务长联系了 Zinch 中国的 Tom Melcher，说要招收 250 名中国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时，教务长说他们学校今年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他说，为了填补这一赤字，他们得额外招收一些付得起学费的学生，而中国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预算收紧使得学校忙于招收国际学生？”Melcher 说，“很不幸，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在 Delaware，管理人员正在尝试新的策略。他们开展了一项计划，让导师和国际学生配对，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美国大学生活。另外，英语学校为课上有中国学生的教授开了班。其他大学也在重新考虑他们的方案。位于 Indiana 州的 Valparaiso 大学开展了特殊课程，给成绩不达标而面临试读期危机的国际学生在英语与学习技巧方面提供额外帮助。

确实也有办法改进招生流程，包括面对面的面试以了解他们真实的英语水平，并且在成绩以外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学术背景。包括 Virginia 大学在内的不少学校都让校友和学生们或是在申请者的家乡，或是通过 Skype 面试申请者。另外，非营利机构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已经开始提供面试服务。这些改变很受不少一线教育者的欢迎。北京的副校长 Jiang（译者注：上文的 Jiang Xueqin）相信，口头的面试可以让大学对学生是否准备好进入美国课堂有更清楚的认识。

一些大学也在雇佣校外人士审核成绩单，或在中国开设办公室，让中国的工作人员辨认学校可能忽略的问题。但是考虑到如此大量的人数，面试与彻底评估每一位申请者仍然是既艰巨又昂贵的任务。

Delaware 的 Stevens 已经与国际学生打了将近 30 年的交道了。对像 Stevens 一样的大学官员来说，他们仍然在试着破解中国学生这一复杂的密码：“我们怎么找到他们？我们怎么让他们加入我们？”

他说，“这个问题仍然能让我彻夜不眠。”

（原文选自译言网，译者 panelcu。
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bilingual/229859/376384）



【返回目录】



【策】

9-6 许志永：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具体建议方案如下：（一）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一年以上，子女可以选择在父母居住地就近上学，平等接受教育。（二）以学籍和学校证明为准，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一年（教育落后地区可以三年，北京、上海等特殊地区可以五）年以上，可以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一、现行依附于户籍的高招体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有 2 亿 2 千多万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例如北京的非户籍常住居民 704.5 万，占常住人口比重的 35.9%，上海这一比重略高于北京，深圳则达到了 77%。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他们的事业、家庭、不动产、交际圈均已扎根于输入地，绝大部分城市新移民不会再返回原籍。然而新移民作为输入地的纳税人，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承担市民义务的同时，却无法享受与输入地市民相同的权利，其中一个日益凸显的矛盾便是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根据我国目前的高招制度，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全国教材和高考试卷不统一，这迫使大量城市新移民不得不把孩子留在户籍地读书，大量孩子即使随父母在居住地城市读到初中最终也要回到户籍地读高中和参加高考，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一，带来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据我们对各行业各阶层抽样得来的 100 个非京籍居民家庭的调查结果，把孩子留在户籍地上学的主要原因，6%是因为在大城市生活和上学经济负担重，5%是因为工作不稳定或者将来打算回老家发展，5%原因复杂或者说不清，4%留在老家更方便照顾，80%是因为户籍教育体制问题，这包括不能正常升入高中、不能参加高考、以及由于户籍歧视产生的小学入学难、赞助费等问题。根据 2007 年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约 5800 万。这些孩子普遍缺失正常家庭生活，缺少家庭教育，缺少安全保护，根据一些部门的调查，57%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参见全国妇联 2008 年 3 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表达对留守儿童的关怀，但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打破户籍壁垒，让孩子跟随父母生活和上学，父母在身边比任何部门和组织的关爱都更能让孩子感到幸福。

第二，严重影响了很多孩子的前途。虽然有户籍壁垒，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父母还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根据 2010 年的统计，仅在北京就有 40 多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些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只能回户籍地就读，这对于很多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的孩子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由于远离父母，教材不一样，甚至语言不通等一系列原因，很多原本成绩优异的学生回到陌生的户籍地成绩一落千丈，一些孩子过早退学走上社会。以北京国子监中学的从圆圆为例，她爷爷军转有北京户口，但奶奶没有，根据当年的户籍政策，在北京出生的爸爸也就没有。从圆圆作为第三代移民，由于父母没有北京户口，尽管她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在国子监中学全年级第一名，市三好学生，2010 年初三毕业后不得不回到陌生的户籍地上学，由于远离父母生活不习惯等原因，一年之后在河南某中学成绩排在班里中下。从圆圆的同学章旭东户籍在河北张家口，初三回户籍地读书，原本班里前几名的他到了张家口某中学在全班 80 多名学生中排名 80 位以后，一年后辍学。类似这样的个案不计其数，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孩子辍学比例更是惊人，以朝阳区一个 1300 多名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初一初二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共约 90 名学生，到了初三只有一个班共 40 多个学生，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陆续转回老家上学，其余的陆续失学。2009 年这 40 名初中毕业生有 10 个上了职高或者中专，有 4 个回老家读高中，剩下 20 多名学生都已经走上社会，女孩子卖服装，当收银员等等，男生基本上无所事事。

第三，引发犯罪率上升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温暖带来心理健康问题，一些孩子因为户籍歧视被迫失学过早走上社会，户籍歧视带来的严重不公平感引发对社会不满，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2010 年工作报告，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由 2006 年的 12%上升到 2009 年的 52%。当今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即使非法移民，其子女也有权利接受教育，而中国则同一国内，只是因为户籍不同，子女不能平等接受教育，这比很多国家的“非法移民”还不如。一系列的户籍歧视导致城市新移民不能自然融入所在城市，这种歧视在移民第二代身上更加明显，长此以往必然积累社会矛盾，以至于出现社会动荡。



以户籍地为标准的教育体制阻隔孩子随父母成长的天然权利，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人口问题——城市人口容量并没有一个可计划的标准何况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也不是教育资源问题——在全国中小学生普遍减少的背景下大城市完全有能力承担所有纳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人道问题，孩子随父母生活天经地义。

子女随父母在工作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是对应的，一个城市既然接受了新移民工作、生活和纳税，就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而不应以户籍为借口，而在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对新移民进行歧视。北京将近 2000 万纳税人，却只想负担 1200 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这不公平。给随迁子女在父母工作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的机会，是居住地城市的义务。

如果说，由于历史形成的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新移民本应享有的诸多市民权利，比如就业机会平等、住房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将影响他们一生，刻不容缓。为了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为了所有纳税人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为了数千万家庭团聚的幸福和下一代健康成长，取消高考户籍限制，随迁子女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是时候了。

二、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打破户籍限制，中国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自愿选择工作和生活地，履行了市民义务，就应当享有市民权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子女有权利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和参加高考，一个城市内部所有居民的孩子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

当然，考虑到历史形成的教育水平和高考录取率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按经常居住地入学和参加高考一步到位可能短时间内会带来高考移民、人口输入地短期内教育资源不足等现实问题，我们主张，在一定时期内设置一定限制条件，逐步放开城市新移民子女在经常居住地上学和参加高考。

但是，限制条件不能过于苛刻，不能把多数城市新移民排除在外，设置限制条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居住地原则，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参加高考和录取的权利，不是“异地高考”，不是回到户籍地录取。有人提出“就地高考异地录取”的方案，虽然在技术上更具有策略性，但是从长远看，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是历史大趋势，居住地高考和录取时机已到，不需要绕弯

子了。第二，满足多数非户籍居民需要的原则，设置条件不宜对现有城市非户籍居民过于苛刻，不是要把多数人排除在市民权利之外，而是要考虑到绝大多数城市非户籍居民能够满足的标准。第三，平等原则，设置条件的标准不应当是地位和财富，而应当是工作和生活的年限，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这个城市必要的。第四，科学性原则，设置条件主要目的是放开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同时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地区教育水平和大学录取比例差异带来的"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

具体建议方案如下：

（一）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一年以上，子女可以选择在父母居住地就近上学，平等接受教育。

简要说明：一年的限制条件与现有民法"经常居住地"标准相符，背景含义是，一个公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城市，愿意留下来，工作一年以上视为该地市民，享有市民权利，当然包括子女受教育权利。一年期限以自愿登记为准，这意味着要改革现有暂住证制度为居住证制度，根据登记年限确定市民权利，鼓励新移民自愿登记。

（二）以学籍和学校证明为准，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一年（教育落后地区可以三年，北京、上海等特殊地区可以五年）以上，可以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简要说明：一年和三年的学籍限制是考虑到现有教育水平的地区不平衡，防止高考移民，通常情况下，一个学生在新的地方学习一年以上，成绩基本也就融入了当地教育水平，但是考虑到教育特别落后地区水平差异很大，可以考虑三年学籍的限制。五年的条件限制是考虑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市民历史形成的某些特权对潜在移民具有的特殊吸引力，为避免高考移民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快速膨胀，需要更长的限制条件。当然，限制条件应当随着教育水平的平衡而逐渐缩短。

三、建议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建议方案面临三个方面的担忧：第一，人口问题。有人担心，在教育水平和高考录取比例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户籍限制，会出现大量高考移民，导致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超过承受能力。第二，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人口输入地新移民的孩子大都跟随父母在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一定时期内会对人口输入地的教育资源形成压力。第三，在人口输入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

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以下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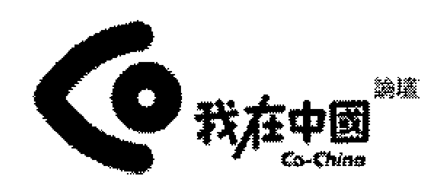
（一）关于人口过快膨胀问题

有人担忧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会导致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导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进而带来城市水资源、生活环境乃至社会稳定问题，可以说这种担忧是目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障碍。那么，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是否必然带来人口快速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这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关于教育移民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不同省市之间升大学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直接引发了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现象，即使现有户籍制度下，“高考移民”也屡禁不绝。前面提出的建议方案里学籍限制在制度层面基本上能够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即通常在人口流入地学习一年以上就会融入当地教育水平，一年以上的学籍限制即可让高考移民失去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持续保持现有高考录取率的地区差异，确实会产生教育移民，即提前一些年避开学籍限制移民高考录取率高的大城市。解决教育移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高招体制，实现高考录取各地区大致平等。

基于此，我们建议：（1）调整招生指标，确保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在各省按考生人数录取比例大致平等；（2）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直至取消指标分配，高校把全国统一考试成绩作为主要参考条件，以联考、面试或者其他方式录取考生，教育部职责逐渐由主导高考录取变成监督高考录取，确保高考公平；（3）各省不再自主命题，教育部设置全国统一试卷考试，作为学生的高中毕业成绩，也作为高校招生的条件。

当然，根本实现高考录取平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高考录取平等并不必然是作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先决条件，相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有助于推动高考录取平等。以北京为例，即使现有的高考录取人数不变，一旦按本文的建议方案开放户籍限制，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北京参加高考的人数五年内将增加近 40%（以现有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比例推算结果），大学录取比例将很快下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高考录取率都在提升），失去了高考录取优势，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为孩子的教育移民北京。加上工作条件的限制，基本上不用担心高考开放户籍限制会带来持续的教育移民。简言之，如果说会出现教育移民的话，那是因为北京在高考录取率方面的教育特权，一旦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有北京非户籍学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此特权将很快消失，教育移民的吸引力也将消失。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大部分将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北京将增加约 90 万人口（参见下文的推算），加上解决子女教育问题消除了一部分潜在移民的顾虑，北京人口会增加。但是，如前所述，不会因为开放平等教育就带来大量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是有限的。

另外，过分担忧城市人口规模也是不科学的，北京目前的人口密度远远比不上东京和伦敦，北京的拥堵等问题主要是管理不科学带来的，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控、开源节流解决的，世界上比北京资源贫乏的城市多的是。一些过分的担忧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翻版，总以为自己能计算出所谓合理的规模，能够控制人口的自然流动，改革开放 30 年，北京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很多。以过去十年北京的人口增长规模，再过十年北京也达不到东京的人口密度。而且应当指出的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开放，北京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特权会迅速消失，由于特权导致的北京的特殊吸引力也会迅速消失，北京新移民增加的速度也会趋于城市化的自然水平。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去十年间增速正在降低，有专家估计 2020 年中国人口可能转入负增长，对于人口膨胀问题不用过分担心。

（二）教育资源问题

放开居住地高考之后，一些原本留守户籍地的儿童将随父母到人口输入地就学，给经常居住地教育资源带来压力。首先，人口输入地政府承担新移民子女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北京这样拥有近 2000 万纳税人却只想承担 1200 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是不公平的，北京等大城市有义务增加教育资源，以保障所有纳税人子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

其次，确实有必要分析，如果依上列条件放开居住地高考，北京等大城市未来几年内教育资源面临多大压力以及解决思路。以北京为例，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的非户籍常住居民是 704.5 万人。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2006 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流动人口的平均户规模为 2.28 人。[3]两者相除，可粗略得出北京市共有流动人口家庭 309 万户。又知其中“单人未婚”的家庭户占 15.6%[4]，排除这部分，并忽略离异、丧偶等不足 1%的情况，得知已婚的家庭为 260.8 万户。同样根据“2006 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这些家庭中，23.3%没有未成年子女，54.7%有 1 个未成年子女，20.7%有两个，1.4%有三个[5]，则目前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家庭共有未成年子女（包括在京的和不在京的）：260.8 万*(54.7%*1+20.7%*2+1.4%*3)=261.6 万。又知，未成年子女中，在北京的占到 55.5%（2011 年我们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比例在提高），而在其他地方（绝

大多数留守户籍地）的则是 44.5%[6]，那么 261.6 万*44.5%=116 万，这是父母在京的留守儿童的大致数字。如果按照正常的年龄分布，应该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是学龄前儿童，但根据我们初步了解，已经在人口输入地跟随父母的学龄前儿童偏多（具体数字有待进一步统计），那么，假定适合上学年龄的留守儿童占整个留守儿童数量的四分之三，116 万*75%=87 万，估计数字是 90 万左右。

如果这些适龄留守儿童全部到北京来上学，北京在现有 120 万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将增加 90 万，考虑到居住五年的条件限制，可以预期，这 90 万中小学生的大部分将在未来五年期间逐步来北京上学，即北京的教育资源需要增加 75%，相应的教育经费需增加 75%，即平均每年增加大约 12%。

增加教育经费 75%对于北京而言短期内会有一定压力，但并不是不可承受。首先，北京市教育资源目前供大于求。1999 年到 2008 年，北京小学学校数量从 2352 所减少到 1202 所，各类中学总数从 754 所减少到 674 所，小学生的学生数量从 836655 人减少到 659500 人，初高中生的数量从 546530 人减少到 544280 人，高考报名人数也是连续 3 年下降，2011 年已经低至 7.6 万人。受人口出生率和开始普及高中教育的影响，北京市在校生数曾经在 1990 年代达到将近 200 万人[7]。也就是说，全部吸纳北京非户籍居民的孩子来北京就学，北京的中小学生数量也只是恢复到 1990 年代的水平略多 5%左右。

其次，从教育经费角度看，北京的教育经费有很大增长空间，2007 年纽约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 31% [8]，而北京 2009 年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 18.58%[9]，如果达到纽约市的教育投入水平，需要增加投入约 67%。总之，如果北京全部接纳非京籍居民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北京中小学生数量将略高于历史最高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比例需要提高 75%，略高于纽约市教育投入占财政的比例。

另外，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即使短期内北京市教育资源不能满足新移民的需求，只要放开社会办学，市场的力量很快能够弥补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不足。以上结果基于一些调研和分析，如果以五年为条件限制放开居住地上学和高考，北京市教委需要认真调研分析，北京市现有多少非京籍居民家庭会把孩子带到北京上学，北京市每年将增加多少中小学生，北京市每年需增加多少教育投入。

（三）关于教育均衡问题

关于第三个问题，必须加大力度推进教育均衡才能根本解决。只要一个城市内部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均衡，必然存在激烈的择校风，给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增加沉重的财务和心理负担。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只要下定决心，是可以解决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把中小学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所有公立学校都尽可能实现平等，包括教学设施的平等和师资力量的平等，教师应当在各学校间定期轮换，私立学校政府不拨款。严格遵照居住地就进入学，跨区域的需要获得批准并且缴纳较高的费用。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具体表现为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择校现象。城乡的免费义务教育虽然早已实现了，但以违规收取择校费为背景的择校现象却多年来高烧不退。在人口输入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因此，为扫除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障碍，从长远计，必须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及由此引发的择校热现象。

近年来，部分城市采取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是，要想真正遏制择校风，必须采取如下方面的实质措施切实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第一，统一办学条件。政府对于教育的财政投入应得到有力保障，特别是对于目前一些师资、硬件及生源较差的学校，应保证其教育基本投入，以达到同一城市内各学校办学条件的大致均衡。公立学校一律平等，消除公立学校里的重点和非重点之分。

第二，师资的均衡化。教师队伍的不均衡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教师资源做不到均衡化，教育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均衡化。如果师资不能得到很好的配置，教育均衡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这是教育能够做到均衡化的重点。那些有好的教学理念的校长、教师不能总集中在某些名校。而应通过采取“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加强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

第三，生源的均衡化。目前已有的探索包括，在升学过程中通过电脑派位等方式弱化竞争性应试的分量，将重点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初中校的到校政策，等等。短期内来看，如果较为平等地分配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愿意留在条件较差的初中校学习的学生实际上将有更高的机会考入重点高中，对于遏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倾向，改善薄弱初中校生源质量会有帮助。

第四，完善教育监督机制。为保证教育师资平等，教育行政部门要形成关于教师流动、教师招

聘任用等重大问题的公正听证协商制度，扩大社会对教育平等进展状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借鉴英国对中小学的督导评估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社会化的做法，教育主管部门应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义务教育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对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间的差距进行监测和分析，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布，动员全社会力量来促进师资平等。

教育均衡确实有很大阻力，因为历史已经形成了某些著名的重点中学。目前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教育均衡政策主要是“填谷”而不“削峰”，即提高落后学校教育水平，不削弱优势教育资源集中的学校，这样虽然也会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消除校际之间巨大差异，不能根本遏制择校风。因此，推动教育均衡，需要教育部门更大的决心，在行政主导的国家背景下，相信教育行政部门只要有决心，完全可以推行教育均衡，社会也会广泛支持，障碍完全可以克服。

四、结束语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在当下社会背景下，确实会面临人口、教育资源、教育不均衡等问题，但是，如上所分析，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是能够解决的。当然，我们理解有关部门的谨慎，但我们仍然要说，子女随父母生活和接受教育，是纳税人的天然权利，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是时候了。

（许志永，法学家、宪政学者。
原文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1083144451_2.html）

【返回目录】

9-7 杨东平：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

“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的职能：将青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在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对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讨论，以求教于各方。

一、 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论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

在语义的层面上，公平（equity, equitable）与公正（justice, just）是近义词。前者与“平等”、“均等”紧密相连，后者更近正义之义。区别公平（equity）与均等 (equality) 的不同含义是很重要的。“均等”重视数量、程度、品质上的一致，但“均等”的分配并不一定是公平的，例如对大小不同的孩子均分食物；同样，“公平”也不一 定是均等的。公平作为一个含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比平等、均等更抽象，更具道德意味、伦理性和历史性。

哈佛大学的哲学大 师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关于公平的著名的三条原则：（1）每个个人有获得最广泛的、与他人相同的自由；（2）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其所获得的地位、职位、利益



应 该对所有人开放；（3）如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应用 “补偿利益” 的办法来保证。他言明了两种性质的公平：一为 “均等性” 的公平，即平等地对待相同者，是一种水平性的、横向的、平均性的公平；另一种 为“非均等性”的公平，是垂直性的、纵向的、不均等的公平，即“不均等地对待 不同者”，如多劳多得、贡献大者先富等。同时，他指出了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中，为处境不利者提供机会或利益补偿。[i]

在教育领域，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

教育权利平等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 域的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成为现代教育的基础价值 之一。40 年代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即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 60 年代以来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浪潮中，教育平等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ii]

教育平等不但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还由于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 的职能：将青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 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这 即是教育的“平等化”职能。[iii]

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由于事实上存在的个体才能、禀赋的差异、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集中在给所有人公平的发展和竞争的机会。

由于传统的教育制度有利于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因而，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主要是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iv]

196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详尽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它包括“消除歧视”和“消除不均等”两部分。“歧视”系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

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之上的任何差别，排斥、限制或给予某些人以优先权，其目的在于取消或减弱教养中的均等对待”。其表现为（1）剥夺某个体或某团体进入各级各类教育的机会；（2）把某个体或某团体限于接受低标准的教育；（3）为了某些人及团体的利益，坚持分流教育制 度；（4）使某些人及团体处于与人的尊严不相容的处境。“不均等”是指：在某些地区之间和团体之间存在的、不是故意造成也不是因偏见形成的差别对待。[v]

有的研究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包括三个层面：入学机会均等、进入不同教育渠道的机会均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事实上，教育公平与其它社会领域的公平一样，可具体地区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平。

起点公平：是指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发展，即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包括在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构造；

过程公平：既指在起点不公的现实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也包括在教育过程和师生关系的互动中微观层面的公平；

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实质性的公平，即教育质量平等，目标层面上的平等。

瑞典教育家胡森认为三种平等分别对应了效率、公平和自我实现这样三种主要的社会价值：效率优先的起点平等论，在教育权利权利平等的前提下，经高度筛选、分流的教育制度，着重考虑经济合理性；公平优先的形式平等论，要求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教学过程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儿童，让他们享受同样的教育；突出个性发展 的实质均等观，以承认个体差异、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前提，给每个儿童提供不同的教育，使其天赋、个性得以发展。但如前所述，这种“差别性对待原则”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使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获得最大利益。

在现实的社会中，教育公平都是相对的，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而逐渐扩大和深入。作为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政策，扩大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径是：实行义务教育制度，逐渐普及教育；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消除基于偏见、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努力纠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并首先帮助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层和群体，等等。

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经常处于难以兼得的冲突状态。教育发展面临类似的

困境。但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的是，教育领域的这一矛盾呈现自身的特殊性。研究表明，在基础教育阶段，这两者的目标是高度重合的，“在发展中国家， 普及基础教育不仅是最公平的，也是效率最高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教育公平问题的特征和重心是不同的。在发展之初，贯彻“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 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保障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初步普及之后，追求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公正待遇和更高的教育质量，即对教育品质的追求。一般认为， 就事实而言，世界各国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比教育机会不公平严重得多。“人人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仍然是 20 世纪末的重大挑战之一”[vi]

而平等学业成就的实现，至今仍然是一种比较遥远的理想。它不仅反映了与生俱来的个体差异、适应这一现实的“差别性教育”的不足，也反映了在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中，具有传递性的“文化资本”在教育中的深刻作用。

二、 建国后我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同纲领》确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对旧教育的否定和改变，突出体现在面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接受教育。

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教育的发展不仅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资源状况所制约。在新的政治理论指导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发展面对一些基本的矛盾，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

1、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权利

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点。五十年代掀起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推广“快速识字法”，遍树扫盲模范，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为了迅速普及小学教育，1951 年甚至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新学制，结果由于行不通，一年之后重新恢复原学制。在各种业余学校、夜校、工农速成学校、 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之中，许多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

从 1950 年起，建立了一种学制三年的工农速成中学，专门招收参加革命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为高校输送人才。它成为建国初期工农、干部进入大学的重要途径，在当时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开始呈现，其典型如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它引起毛泽东等人的警惕，于 1955 年通令取消干部子弟学校。[vii]但是，事实上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另一方面，值得认识的是，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对“人民”的概念逐渐加以区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 反动分子阶层。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且要在文化上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升级的背景 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在高校入学、毕业生的分配、使用、出国、提拔任用时，根据家庭出身予以不同对待，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例如，虽然有统一的入学考试制度，建立了“分数面前的 平等”——形式的平等，但在录取学生时要“贯彻阶级路线”，执行有关政策。[viii]于是，对学习的资格和学力的评价出现了“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 这样两种标准，“红专关系”成为整个教育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 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群的歧视性政策，在文革中发展为赤裸裸的“血统论”。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一具有封建意味的“左”的政策已经被摈弃。

2、实行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除了恢复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教育权利，新中国的教育还面临另一重紧要的任务：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培养和输送人才。 因而，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在“公平-效率”的两难选择中仍然存在现实的困惑和冲突，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这被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理论认识上的区别，是认为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重要的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 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在教育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普及基础教育；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是尽可能地使大多数 人享受平等的教育，还是对少数人实施特殊的“尖子教育”，等等。

在五六十年代现实的发展中，围绕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建设，我国教育实际走的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国家教育投资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并且免收学费；

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呈现“重理轻文”的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层层选拔尖子，培养少数英才。

这一选择的利弊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其主要成绩是为我国五六十年代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其问题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致 使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受到损害。教育发展的重心在高等教育，体现的是国家对“效率” 的追求，强调教育的直接功利价值。在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主要从国家的总体目标出发，并不是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因而，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有平衡布局的政策，但地区差距并没有有效地缩小。例如，中西部许多省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重点大学。

由于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又财力不足，重高等教育的直接后果是轻基础教育，致使基础教育长期薄弱。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落后的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制约。这一选择总体而言对经济发展并不是高效的。

3、在教育发展路径上的冲突

在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工农大众的教育权利是由政治革命所直接赋予的，并主要运用革命的方式——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扫除文盲、普及教 育。当时对普及教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期望，以为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工农教育的面貌。[ix]具体的教育实施，基本是解放区时代形成的非正规的、短期速成的补习性教育。

这种普及型的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 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x]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校门之 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xi]

毛泽东成为当时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 在1958 年和六十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体现了与之很不相同的 教育理想和教育价值。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 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

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这一努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 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1958 年的教育革命，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革，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开辟了保送入学的途径。[xii]另一方 面，是通过改革和缩短学制，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他并且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 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xiii]

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和改革教育的努力，一直延伸到文革时期。文革中种种"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不少早在文革前就开始了。例如，1963 年，教育部实行 中专招生、分配方法改革，采取公社保送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各地在农、林、医、师等类中专学校进行"社来社去"的试点。1964 年，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要求选拔政治思想好，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身体健康，年龄在 27 岁以下，有 3 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这几乎是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雏形。

今天，可以认识的是，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在 文革中取消高考制度之后，免试推荐制度演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此外，他对家庭出身、以及产业工人、贫下中农这种社会身份的痴迷，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它同时导致了对非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权利普遍的剥夺，又制造了另一种不公正。这一代价高昂的"实 验"，为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至于毛泽东用政治批判、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教育革命"，以冲击制度化的"条条框框"，其破坏和摧 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众所周知。 实际上，利用国家的力量大规模推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化途径是存在的。基本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立法建立国家的义务教育制度。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十分重视面 向人民大众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但直至 1986 年才正式颁布《义务教育法》，将普及教育纳入法制的轨道。

同时，五六十年代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如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面向大多数人还是实行"尖子教育"，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等等问题，作为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都将长期存在，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和恰当应对。

三、当前影响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育公平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对“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重新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 确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已基本不复存在。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差别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是中国最 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在农村，问题仍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则在义务教育后的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问题较突出。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权利受到影响。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哪些人才能享受好的教育，教育过程和教育质量的平等，均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主要是历史形成的，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 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不公；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因而，认识这一制度性因素，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当前的教育现实中，这种制度性的不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1、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仍未改变

对于历史形成的巨大发展差距，公正的教育资源配置应当体现：通过恰当的配置不再人为地继续扩大这一差距，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向落后地区倾斜，以主动缩小差距。近些年来的现实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之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仍然明显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呈拉大之势。

我国在 80 年代中期下放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建立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尤其是县、乡政府。在极大地调动 了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的同时，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乡级财政能力的不足，县际之间、乡际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实施。由于中央财政承担 义务教育的比重极低，虽然采取了一些单项的“工程”、“计划”，但由于没有建立起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有从制度上加以解决，致使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贫弱地位没有根本改善。

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财政拨款过多用于高等教育，对义务教育投资不够。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均 GNP600-2000 美元的国家，学前和小学阶 段、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

为 40.5：29：17.9；生均教育经费为 1：2.5：9.2。[xiv]在 80 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曾高达 30%以上，现已逐渐下降。1997 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三级教育的比例为 34.25：37.15：20.32，高等教育的比例仍超过 20%，[xv]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过高。而且，高教经费总量中 80%来自政府，义务教育经费中却只有 60%来自政府拨款，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差距也呈拉大之势。1990 年，东、中、西部的教育经费之比为 1：0.63：0.55；1995 年，这一比例扩大为 1：0.50：0.36。[xvi]根据上海智力所 1997 年的研究，我国义务教育的差异度，全国可分为五类地区，最发达的 A 类地区为北京、上海、天 津；B 类地区为辽宁、江苏、浙江、广东；最差的 E 类地区包括宁夏、甘肃、云南、贵州、青海、西藏。1988 年， A、B、E 类地区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为为 2.8：1.5：1.01994 年，这一比率为 3.0：2.0：1.0，呈加大趋势。[xvii]

2、教育政策中的“城市取向”

导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除了传统的以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无视城乡差距、以城市社会和居民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 城市人的利益，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等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具有一种社会福利的性质，尤其是过去免费的 高等教育，因而长期也体现“城市优先”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一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仍有较大的惯 性，依然潜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并予以矫正。 例如，无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 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无疑是很不公正的。多项调查表明，导致农村学生流失辍学居第二位的重要原因（仅次于经济负担），是由于教学难度过高，致使许多 学生难以胜任，成为学业的失败者。[xviii]这一“规则的不公”导致了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其背后，正是“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作祟。以 1997 年我国城乡普通中学的状况看，约占总数 70%左右的农村人口，农村学生占初中在校生的比例为 56.85%，在高中阶段农村在校生仅占 14.55%。[xix]近年来，我国初中生辍学率上升，农村辍学率偏高。1998 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 3.23%，达 167 万人，比 1997 年上升 0.09 个百分点。农村辍学率为 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97 个百分点。有的地方高达 10%以上[xx]。

近年来，社会反映强烈的不同省市学生、城乡学生高等学校入学机会不公，为突出的例证。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 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录取定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是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1998 年，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非农村学生为 376 分，农户生按不同区划分别为 532 分、529 分，最大差距达 156 分，引起强烈不满。[xxi]

3、阶层差距拉大引致的教育不公

在当前我国教育大发展的新形势中，教育公平的问题再次突显。

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各类教育收费一再增加，造成学生中一个规模不小的贫困生阶层。许多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子女被高昂的学费拒之学校门外。非义务教育高收费 的后果之一，是农村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抬头，由于继续升学十分昂贵，在经济上难以承受，他们选择了辍学。应当指出，近年来我国大学收费急剧增加，年增幅达 30%左右，是脱离我国实际国情的。

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不均衡、接受好的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的不公，受到普遍关注。一方面，私立学校、民办公助学校 等不同类型学校的出现，增加了教育的多样性和家长的选择性；与此同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那些“好学校”都高额收费，甚至远远高于大学收费。上好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家长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这固化和助长了城市社会中业已存在的阶层差别，是不利于增进社会平等的。

造成目前公立中小学质量存在极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 80 年代以来，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面临这一选择：是优先满足大多数儿童的基 本教育需求；还是使一小部分人受到较好的教育？我们沿袭五六十年代的思路，选择了通过强烈竞争、筛选、淘汰，以培养少数“尖子”为目标的精英路线。层层设 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人为地造成了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垃圾学校”。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xxii]这种把学校、学生分为不同等级，为了选拔少数“尖子”，而使多数儿童的利 益受损的教育，是违背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应试教育”的制度基础，目前正在纠正、改变之中。参考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经验，

当前，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应当明确实行“学校均衡化”的方针，尽可能地减少——至少是不再人为扩大——公立学校之间不应有的巨大差距，以利于实施义务教育和扩大教育公平。

4、教育腐败加剧了教育不公正

由于在我国教育资源仍然属于短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长期被认为是“一方净土”的教育，也受到社会腐败行为的侵扰。同时，在教育领域部分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也导致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扭曲，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

这种腐败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上，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其中一类是所谓的“条子生”，通过某种特权进入学校（重点中小学、大学和成为研究生）。第二类是“缴费生”，不符合入学标准，但通过花钱买分数取得入学资格。在“缴费生”中，更有一部分是利用公款上学的，例如目前蔚然成风的领导干部读博士，大学设“博士研究生班”。第三类是“学校利益集团”，例如今年高考中揭发出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作弊案，假保送生皆为学校领导和教师子弟。在各级教育中，本校教师子弟在入学时享有某种优惠，已是普遍现象。虽然一些不规范的办学和收费行为并非都能定性为“腐败现象”，但它确实提出了学校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尺，在市场环境中必要的道德自律，以及维持学术水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严重的腐败行为加深了我们对教育公正问题的认识。就高考制度而言，保送生制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等一些通行的制度正在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也提示了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方向。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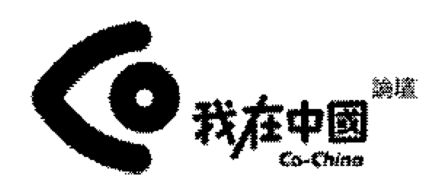
[i] 详见张民选著《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年。

[ii] 查尔斯.赫梅尔著《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第 68 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年。

[iii] S.鲍尔斯、H.金蒂斯著《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第 28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

[iv] 查尔斯.赫梅尔著《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第 69 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年版。

[v] 马和民、高旭平著《教育社会学研究》，第 86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



[v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

[vii] 1952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 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停招寄宿生，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 78 页、144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年。

[viii] 例如，一九六五年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对于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条件均合格的考生，按照报考志愿的顺序和考试成绩的高低，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 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不再采取推荐与考试想结合的方法，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 生相近时，优先录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 380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年。

[ix] 例如，1955 年，青年团中央发布决定，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1956 年，全国总工会通过决定，在三年内扫除全国职工中文盲；1956 年，中共 中央《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普及小学 义务教育"。195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 务"，"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x] 1955 年 7 月，教育部、高教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称"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 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今后应当坚决贯彻业余为主的方针"。转自高奇著《新中国教育历程》，第 22 页，湖北教 育出版社，1996 年。

[xi] 1958 年 4 月，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刘少奇的七点指示，其中称 1954、1955 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很严重，照搬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 221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年。

[xii]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八年招考新生的规定》，本年改变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为更好地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的政治质 量，对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久的老干部，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采取保送入学的办法"。

[xiii] 1957 年 3 月，毛泽东与七省市教育负责人座谈中小学教育。这一意见反映在当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 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 191 页、205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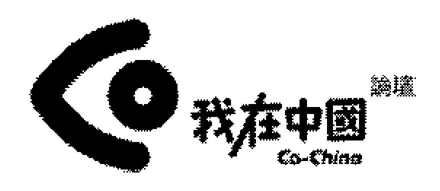
[xiv] 杨丹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教育发展研究》2000 年第 4 期。

[xv]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摘要（1990-19970）》，教育部财务司，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8 年。

[xvi] 杨丹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教育发展研究》2000 年第 4 期。

[xvii]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研究报告，1998 年。

[xviii] 《湖南教育报》，1996 年 8 月 30 日。



[xix]《中国教育年鉴 1998》

[xx]《中国青年报》1999 年 12 月 25 日。

[xxi]《中国财经报》，1998 年 8 月 20 日。

[xxii] 例如，1963 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九省市区共 135 所重点中学布局的调查，城市占 62%，县镇占 32%，农村占 6%；其中七省市农村连一所重点中学都没有。见金一鸣著《教育社会学》，第 100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杨东平，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和文化学者。）

【返回目录】

【思】

9-8 张千帆：走向更为公平的大学招生制度——中国问题与世界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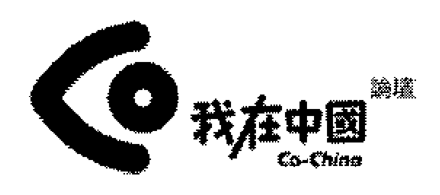
“宪法第 33 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 46 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国现行招生考试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探讨了世界其它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与考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无论是国外经验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显示，大学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要改革中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中央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由于高校在财政、土地等资源上严重依赖地方政府，在招生指标分配过程中面临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双重压力，因而不可能主动对全国各地考生一视同仁。要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中央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一、引言

教育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宪法要求政府切实履行的基本义务，而受教育机会也是宪法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近年来，中国教育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并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然而，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 9 月在北京市第 35 中学听课后指出，中国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1]

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招生指标制度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改革开放



之后，虽然中国在许多领域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但是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剧。分省招生指标制度造成大学生源的地方化和录取标准的严重不公，限制了广大地区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使大学不能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使中小学不可能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使个人得不到正常的德性和智力发展，使国家得不到适合政治、经济、社会与法治建设的人才。

大学本科是青年成长的关键阶段，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对国家人才培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大学教育，招生与考试制度决定了高校可以招收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学生可以接受什么质量的大学教育并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对于基础教育，招生考试更是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引导全国每年千万考生乃至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向。招考制度改革事关中国每一个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理应成为国家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中之重。

本文考察了中国现行招生考试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探讨了世界其它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与考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比较研究表明，大学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在大学对当地存在严重财政和资源依附的情况下，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中央的主导作用。只有中央发挥有效作用，才能打破大学和地方的利益纠葛，有效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并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二、中国大学招生存在的普遍问题

要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教育，必须实现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在地区之间的公平分配。然而，目前全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分布仍然极为不均衡，城乡差距尤其显著。在高等教育领域，广大农村没有一所大学，几乎所有全国知名学府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严重的是，部属重点院校对本地考生保留了远超过考生人数比例的招生指标，形成了严重的大学招生地方化，产生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



1. 违背宪法原则，剥夺平等机会

高等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理应按照机会平等原则公平分配给所有公民。宪法第 33 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 46 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但是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却要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招生地方化甚至远比北京高校严重，诸如复旦、浙大、武大、南大等国家重点支持的"985 高校"在本地录取考生达到招生总量的百分之三四十，有的甚至高达 50%。

虽然目前已有 16 个省市实行"自主命题"，不同省份的高考成绩失去可比性，高考丧失了统一衡量标准的功能，招生指标体制的地域歧视也变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地域歧视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要看看各大高校的招生指标分配，就会发现在所在省市自主命题前后没有实质差别，因而同一所高校对全国各地考生设置的录取门槛实际上和以前一样不平等。"自主命题"不仅不可能改变大学招生地方化的事实，而且恶化了招生地域歧视的性质；如果说统一高考时代仅限于录取分数的不平等，那么现在则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目前的大学招生体制不仅保护本地考生、歧视外地考生，而且对于外地考生群体也显示出严重的差别对待。2009 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 10 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 4.8 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 1 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 0.7 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2]

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 5.2 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 4.2 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 0.4，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不仅侵犯了不同省市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而且使招生指标的地域分配带上人为复杂性和巨大任意性，为大学招生腐败和幕后交易提供了温床，对招生过程的法治化与公开化则设置了重重障碍。

2. 加剧"高考移民"，恶化资源分配

除了歧视广大考生的平等权利，大学招生地方化的一个直接但经常被忽视的后果是加剧中国社



会的资源配置失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点扶持城市工业发展，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资源分布格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全方位发达的中心，内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则成为全方位资源匮乏、贫困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资源配置失衡格局仍然在起作用，而作为计划经济残余的大学招生地方化和现有的失衡格局相结合，形成了恶性循环、积重难返的困境。历年来，京、沪等各大城市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教育资源优势，而这些省市所在的全国知名学府为本地考生降低录取标准，极大增加了这些省市对人才和资源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资源分配失衡的趋势。

大学招生地方化造成的一个独特现象是“高考移民”。大学对各省分配的不同招生指标造成不同的录取标准，从而自然产生了考生家庭从高标准地区向低标准地区“移民”的理性驱动。目前人们普遍关注每年招生过程中发生的“高考移民”现象，尤其是海南、陕西等录取标准得到优惠的边远省份。其实最大的“移民”对象显然还是北京、上海这些教育资源集中而本地照顾严重的省市，只不过这些省市对“移民”控制很严、要求很高，只有高学位、高职位或高投资的“人才”才可能获得在当地落户的指标，从而使他们的子女享受当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优势。但是这种貌似合法的控制措施只是提高了高考乃至中小学“移民”的门槛而已，而不可能消除“移民”现象的根源。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为了给子女争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安心留在当地发展，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到京、沪等大城市工作，使这些地方的人才、物资、财富更加集中，使其它地区的各方面资源更加匮乏。

3. 阻碍人才流动，扩大城乡差别

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直接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大学招生地方化本身即意味着当地考生占了大学相当部分的名额，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又留在当地工作，不仅不利于人才流动，而且极大了增加当地的就业压力。如今京、沪等地的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都选择在大学所在地就业，一方面造成这些大城市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极大，另一方面造成广大急需人才的地区却人才极度匮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同一个国家，无非是因为计划体制长期造成的地区差异，而保护地方考生的招生指标制度无疑是维持地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奇怪的是，不少大学竟以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的现象作为招生地方化的理由，而不知道这种意识恰恰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从国家层次上考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均衡发展取决于是否能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而大学招生地方化显然是人才流动的障碍。

人才流动不自由的受害者首先是农村。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广大农村已经成为没有



人愿意留驻的全方位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央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力度，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人才和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大学招生地方化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差别，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连年滑坡。这种现象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诸如山东、河南等农业比重大的省份考生基数也相当大，因而往往成为京、沪等地大学招生的歧视对象，农业为主的省份得到的招生指标远低于其考生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再加上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不发达，农村考生在高考面前本来就处于劣势。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招生指标制度，任由大学招生地方化发展下去，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和地区差别。

4. 增加高考压力，阻碍素质教育

在大学招生过程受歧视的农业地区往往考生人数多，而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因而即便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不足以满足当地的入学需求，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严重失衡，当地考生的高考压力巨大。在山东、河南等考生大省，高中学生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拼命复习，放弃了文体课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影响了正常的身心和智力发展，应试教育现象极为严重。面临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任何素质教育措施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即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推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也正是这些大城市所在高校实行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借口之一，但是实际上依然是应试教育盛行，孩子们和家长们在各种辅导班、补习班、奥数班之间疲于奔命。分省命题和招生地方化不仅没有兑现素质教育的承诺，反而加剧了针对考生大省（往往也是农业大省）的歧视，至少使这些省份的应试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

更不用说，大学招生地方化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错误配置，使最好的学生得不到最好的教育，使师资和研究实力最强的大学失去了培养顶尖学生的机会，进而降低大学教育质量并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5. 引发公众不满，影响社会和谐

目前，高考招生歧视引发的地区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缘由。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侵犯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考生利益，理所当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在今年 3 月“两会”期间，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腾讯网联合举办了针对高校招生制度的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3/4 的网友认为现有的高校招生政策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公平，同样比例的网友认为部属高校按省份投放招生名额的做法不公平。对于某些高校以“学校的历史传统”、“往年招生历来如此”等作为向不同省份分配录取名额的理由，3/4 的网友表示不能接受，其中高达 46%的网友强烈表示





“完全不能接受”。[3]

由此可见，高校招生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众矢之的，不仅引起了许多网民的不满，而且也容易激化不同地区的矛盾。

为了保障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遏制普遍盛行的大学招生歧视、促进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和自由流动、构建和谐社会秩序，中国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在提出针对中国现状的改革方案之前，有必要适当参照和借鉴其它主要国家的相关经验。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存在一定的普适规律，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应该符合各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律。如果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偏离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招生考试模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更值得怀疑了，而世界各国的主流模式也为中国招考制度的改革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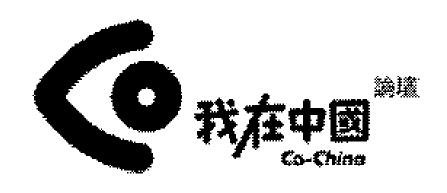
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借鉴和比较世界主要国家，我们调查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法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不同国家具有大同小异的高等教育体系。简言之，可以根据大学的性质将世界各国的大学分为三类：国立大学、地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类似于中国的“部属高校”，由中央政府设立并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维持；地方公立大学则是由州、省或其它层次的地方政府设立，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维持；[4]

私立大学相当于国内的“民办院校”，由私人创办并主要依靠学费、私人捐赠等民间资源维持。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制度，不难发现以下普遍规律：一是根据宪法或法律规定，国立大学有义务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在原则上采取平等的录取标准；二是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当地考生，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实行不同的录取标准，但是如以下德国宪法判例显示，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对当地考生的照顾在有些国家也存在宪法上的限度；三是私立大学一般遵循因材施教、择优录取的原则，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的：除了某些国家的地方院校之外，所有这些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地方保护主义，更没有设置地区指标制度。

1. 国立大学——机会平等不容许地域歧视



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家中，凡是国立大学都在宪法或法律上有义务对所有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不得在招生标准上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国立大学”；尤其是联邦国家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公立大学往往是由州或地方政府设置的，譬如美国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被定性为“国立大学”，但是某些更偏向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仍有“国立大学”。譬如实行联邦制的印度和中国同样都是人口大国，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也大致相当，但是印度的公立大学招生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地域歧视问题。从 1947 年印度独立到最近几十年，印度的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可以自主制定招生政策，但是为了确保学生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印度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地域或其它方面的限制。

单一制国家一般规模较小，中央集权特征也更为明显，公立大学往往都是国立大学，而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必须遵循宪法平等原则，不得在招生过程中实行地域歧视。例如实行单一制的英国历来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ies)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性，但是并不能在招生过程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譬如布里斯托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招生活动确实主要针对本地学生，如与本地中学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招生宣传并鼓励本地学生报考，但是这几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均表示这些活动只是一种便利的招生策略，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和主要的潜在申请人建立联系，而并不意味着本地申请人在录取机会上获得任何优势。因此，英国大学的主要招生标准是学术兴趣和能力，而非家庭所在地等不相关因素。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普遍原则是国立大学招生不得实施地方歧视，更不能人为设置大学在各个地区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制度不仅意味着大学招生对本地考生的偏袒、对外地考生的歧视，而且也导致对不同省份之间的任意区别对待。无论是招生地方保护主义还是各省指标分配的任意性，都不符合宪法要求国立大学履行的机会平等义务。

有人认为，上述普适经验未必适用中国的“国立”（部属）大学，因为中国的部属高校名义直属中央，实际上接受一定的地方财政支持，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尤其是近年来发展的“省部共建”模式要求地方对于中央财政投入给予配套资金支持，譬如“985 工程”保证全国 39 所重点高校每年一定的经费，由中央和所在省市各承担一半。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划拨等方式给予大学各种支持，而大学理应通过划拨更多的招生指标对地方支持予以一定回报。然而，地方支持虽然构成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和原因，却并不足以为其提供足够的正当性。在土地国有的宪法体制下，大学所在的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地方政府只有管理权而非所有权，即便地方居民也在原则上和全国人民一样共同享有大学所在的土地，因而土地划拨并非地方有权赠送大学的 “礼



物”，而是拿着属于全国的财产“借花献佛”，因而也谈不上大学的“回报”。事实上，即便大学和所在地方确实存在利益互惠关系，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本身也通过为城市培养和输送大批高层次人才、为城市治理出谋划策、改善城市人文环境乃至作为旅游景观做出诸多贡献；换言之，地方对大学的投资并非只是付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投入。况且即便大学有必要对地方财政支持有所回报，最合理的报答方式也显然不是损害教育资源配置的招生地方化，而是不损害宪法平等或影响因材施教的减免本地学生学费等方式。因此，地方财政支持并不能为部属大学招生地方化提供适当理由。



2. 地方公立大学——招生地方化或有宪法限度

地方公立大学由州（省）或地方政府设立，主要靠地方税收维持，因而被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对当地居民有所照顾。譬如美国没有“国立”(national)大学，公立大学全部是地方性的“州立大学”或社区学院。虽然某些州立大学也是全美乃至世界知名学府（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等），但是由于它们是由州政府设置并主要依靠州财政维持，州的纳税人对于其运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无论是录取还是学费都可以对州内和州外居民采取双重标准。有的州立大学甚至将 90%以上的名额保留给本州，而美国法院似乎并不认为这种招生“地方化”违背平等原则，因为州立大学本身就是“地方化”高校。

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法院之所以认可州立大学的地方化招生政策，是因为联邦对州立大学的投入和州相比很小。在澳大利亚，虽然公立大学也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大学，但是由于联邦投资比重相当大，联邦政府控制着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因而公立大学顾忌联邦制裁而不敢在招生标准上倾斜本地。事实上，联邦资助决定了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并不是标准的地方公立大学，而是“准国立大学”；既然公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自全国纳税人的贡献，招生过程理应平等对待不同地区。

即便真正意义的地方公立大学也未必可以随便照顾当地考生。在印度，只有完全以邦自己的财政建立和管理的医学类或技术类教育机构才会在招生过程中考虑学生的地域因素，并在录取标准上偏向本地学生，但是即便如此，地域也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联邦德国则更是通过宪法审查制度控制州立大学对本地居民的优惠。和美国不同，德国宪政法院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平等实行更严格的控制。例如巴伐利亚州的《大学入学许可法》第 3 条曾规定，如果入学申请者居住在巴伐利亚州并获得该州或邻州的大学前教育结业证明，那么应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获得优待；如果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就读离其住所最近的巴州境内大学，就可以获得加分。在慕尼黑大学医科专业的申请人挑战这一条款的合宪性之后，联邦宪政法院判决其违反了《基本法》的一般平等原则、社会国体原则和第 12 条保障的择业自由。法院认为，国家机关受宪法原则限制，不得在界定受益范围过程中将部分国民排除在外，进而限制择业自由并造成国家对职业的操控；单方面优待本州居民，必将对其它州的居民造成不公待遇。只有保证入学机会不受任何州的出生地限制，才能实现自由选择学校和职业的权利。[5]

我们认为，德国和印度的相关经验更值得借鉴，因为德国和印度体制和中国更为接近。同为联邦国家，德国、印度和美国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地方化之所以采取不同措施，是因为德国和印度

的中央化程度更高，因而即便地方公立大学也有义务遵循联邦宪法原则。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只有一部宪法，宪法平等原则和受教育权同样适用于各级政府和各类公立大学；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属还是地方院校，都同样有义务遵循宪法平等原则。因此，即便地方院校的本地照顾也应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地方院校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绝大多数师资强、待遇高、设施好的地方院校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财政实力雄厚的发达省市，而这种格局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整个国家长期推行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既然这些省市曾经是中央集权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今天也理应履行一定程度的全国义务，让来自其它地方的考生也能平等分享全国共同创造的地方优势教育资源；否则，如果任由地方院校照顾本地居民、排斥外来考生，只能加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3. 私立大学——推动招生平等的楷模

如果说美国的州立大学是招生地方化的典型，那么私立大学则成为招生平等的楷模。和州立大学等地方公立大学相比，美国私立大学招生呈现出高得多的国家化甚至国际化程度。由于私立大学在财政上并不依附于各州，州法显然也没有正当理由要求私立大学录取标准向本州倾斜，私立大学也没有理由为了照顾所在州而牺牲自己的生源质量，因而几乎没有例外都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录取的首要考虑因素。例如常年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中没有提到任何地区照顾，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地区招生指标。事实上，哈佛招生政策明确表示不对任何特定的学校、社区、州或国家设置配额。在高级中学的学业成就很重要，但录取委员会也考虑很多其它的标准，如社会参与（community involvement）、在课外活动中的领导才能和荣誉以及工作经历。

和美国相比，英国的私立办学的传统更加悠久，自牛津、剑桥开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英国私立大学也同样是招生平等的典范，牛津、剑桥、伦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实行任何地域指标分配制度。政府对高校招生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名额分配要求，因为具体的招生决策完全取决于各个高校本身，政府的职责在于监管而非直接插手大学招生政策。譬如作为面向全球的私立大学，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非常明确，即考生的学术能力与潜质，包括考生的学习能力、学术兴趣以及以往经历与所申请专业的契合程度。

英美私立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民间完全有能力创办和管理世界最好的大学，而私立大学也完全有动力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因材施教、择优录取，打破地域等人为设置的障碍，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中国行政主管部门放开对私立大学的管制，允许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同一个

起跑线上平等竞争，那么私立大学完全可以成为打破招生指标体制的主导力量。

4. 考试制度——多元而统一的评价机制

一旦确立了大学招生的平等原则，考试制度也就相对明确了。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考试制度，共性是极其明显的：在绝大多数国家，考试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任何一种考试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是因为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招生提供评价标准，而不同类型的大学当然适合不同类型的考试，但是对于任何一种考试而言，考试又是全国统一的，否则就无法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招生标准，形形色色的招生歧视也就屡见不鲜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考试可以多种或多次，但是任何考试都必须具备全国统一的标准。

英国的考试制度相当复杂，但是要进入研究型的高等院校，考生一般都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A-level）考试。有些大学（如公立的朴茨茅斯大学）只要求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有些大学则还要求第二轮考试。譬如在通过全国统考和纸面材料审核之后，牛津大学还对筛选出来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以测评申请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接受新思想和信息的能力、智力的灵活性和分析推理能力。牛津的面试包括笔试和口试，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录取率都在 10%以下。[6]

邻国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文化，两国注重教育的国民心态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而日本招生考试经验对于中国具有显然的借鉴意义。然而，日本的考试招生制度却和中国大相径庭，日本国立大学并没有地区性招生指标。和英国类似，申请日本的高层次大学需要通过两次考试：在全国范围内，由大学入试中心组织统一考试；通过"中心考试"后，大学还可以设置自己的学力考试。例如东京大学就有两次入学考试，但无论是全国统考还是大学自主考试，对日本国内不同地区的考生都是原则上平等的。

当然，也有个别国家并不实行统一考试，譬如澳大利亚就没有全国统考，大学主要根据申请人的中学成绩和省会考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但是经过历年招生实践，澳大利亚对于不同地方的中学成绩和会考成绩还是形成了一套比较准确的折合标准，从而形成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对于中国来说，澳大利亚的经验未必适用，因为实行分省自主命题之后，各省高考成绩之间的折算很难找到一个客观准确的公式，因而难以为大学招生提供一套统一的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世界主要国家的国立大学受宪法和法律约束，不得偏袒所在地区的考生；私立大学则为了保证生源质量，不愿意降低标准录取本地学生；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但在某些国家

还是受到宪法限制。事实上，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规定地区指标，也很难发现与此相关的立法规定、司法判决或一般社会讨论，因而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问题；许多外国学者听到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都忍不住表示好奇和吃惊。然而，大学招生指标分配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全社会关心并已造成诸多后果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学招生实行的地域指标制度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中的一个异数。这套制度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或需要，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符合教育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需要，也不符合宪法平等要求，因而亟需改进。

四、中国大学招生改革何去何从

无论是国外经验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显示，大学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要改革中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中央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各地高校招生之所以存在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主管部门在教育机会平等方面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监管义务，因而高校录取标准的决定过程处于中央监管失序的状态。由于高校在财政、土地等资源上严重依赖地方政府，在招生指标分配过程中面临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双重压力，因而不可能主动对全国各地考生一视同仁。要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中央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当然，广而言之，招生考试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招生考试的传统模式，而且也要求国家法律制度乃至组织形态作出相应调整。只有建立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并改革中央与地方对招生考试的权力分配，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大学招生指标制度，有效保障全国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这些问题超越了本栏目的范围和篇幅，权且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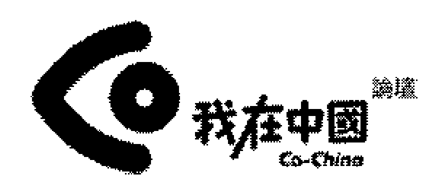
注释:

[1] "温家宝听课笔记刊发：教育需大胆改革"，《新京报》2009 年 10 月 12 日。

[2]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校本部)2009 年招生来源计划，见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4/22/content.

[3]参见"众议高考地域歧视是否存在"，《法制日报》2009 年 3 月 20 日，投票结果见 http://vote.qq.com/survey_project_stat/21368_true.shtml.

[4]当然，个别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例如澳大利亚的某些大学是由省或地方政府设立，却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因而名义上属于地方公立，实质上是"准国立大学"。



[5] 详见本栏目朱应平教授的文章。

[6] 参见王立科：《英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研究》，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论文，2007 年。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150.html）

【返回目录】



9-9 许纪霖：人才至上，还是公正至上？——高考恢复三十年的反思



“罗尔斯有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个人不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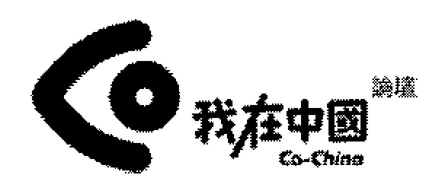
各位广州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是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的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三十年前，九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考了一个消息，说从 1977 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很多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有很多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着。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就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个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高考，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讲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实际上命运是相同的，那一年拜邓小平之福，整个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

今天我就想从高考恢复三十年起讲，高考发展到今天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怎么来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在纠缠着我们，让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总得来说，我个人的看



法，高考恢复三十年，可以分为前 15 年和后 15 年。

前 15 年，大致上高考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它正面的作用更大。为什么说是解放的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高考恢复之前文革，高考不是知识取人，是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当然红更重要，就是你的立场是否坚定、你的出身是否好，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标准。但是邓小平他要拨乱反正，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当时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在哪里？不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理想，而是需要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的知识。所以他果断的当时拍板，在恢复高考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当时叫拨乱反正。这个改变，我们知道高考这个制度不仅仅是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取的不仅仅是大学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精英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精英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改变了历史。一个事件是 1905 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个就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为什么说这两个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呢？第一个事件科举 1905 年废除之后，整个社会精英开始不再往官府流动，开始流到社会上，精英社会化，社会化之后，过去精英只有一条路，通过科举做官，05 年之后各个精英流动到社会上，他们可以经商、可以从军，比如说做记者等等，精英开始多元化。

差不多两年之前，科举废除一百周年时，当时我说过一句话，“没有 05 何来 11”。就是说假如没有科举废除的话，很有可能没有辛亥革命这一回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摧枯拉朽一下子清朝就垮了，这当中新军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军队不再站在朝廷这边。为什么新军倒戈？因为新军当中年轻的军官们，这一批人科举没有废除之前，他们可能继续还是往做官的路上发展，科举废除之后，相当的一批精英，有新思想的精英开始去从军。不要说别人，当初连周作人年轻的时候都到南京的水司学堂读过书，所以他说自己年轻时还做过海军。这批精英当时已经跟朝廷分离，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他们成为军队中的中坚。这批人和朝廷产生疏离感，之后精英跟朝廷分离了。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百姓态度的取向不重要，因为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精英的取向、立场是最重要的，一旦朝廷和精英发生了分离，那这个政治的统治、政治的危机迟早会发生。这是一个大事件，1905 年科举废除，产生一个革命，之后使得中国长期的动乱。

1977 年恢复高考就是倒过来的，中国当年由于毛泽东搞文革，不断的革命、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处于长期内乱以后，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得天下精英重新归入这样一个体制，本来天下乱世英雄都在民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精英回到一个体制里，这次变革使中国从乱到治，使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今天来看，我一会儿会说

到中国之所以从 78 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非常重要的就是和高考制度是有关系的。

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的作用，更重要是解放，为什么是解放呢？因为邓小平要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他要有一个动力，当时叫生产力，什么是最大的生产力？知识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高考制度以知识取人，不再以出身取人，不再以革命的立场取人，这是获得最大的后备，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所以高考恢复前半期，是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

高考慢慢慢慢，特别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比较高的层次，我们会发现高考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这个暴露和什么原因有关呢？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初级阶段，主要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的话，这个知识主要是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它需要的是创新，不再是量的堆积，而是需要知识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错位。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位呢？我们会发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是应试教育。今天来的各位听众，我相信有很多是来自教育部门的，或者是教育管理部门的，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已经是文凭社会，要成为一个社会精英首先要有一个文凭，而且这几年教育爆炸式的发展，大学文凭已经不稀奇了，必须要是名校的文凭，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今天高考成为中国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最大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孩子的未来，能不能跨入社会精英的行列，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竞争实际上不仅仅是从中学、中学，或者幼儿园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胎教就开始了。中国的小孩比大人还辛苦，本来他们童年该享受快乐的时候，但是他们很早就被推入到应试教育的搏杀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了，当年我们第一届参加高考的时候，和当年的教育水准相比是比较难的，当时第一届的录取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只有 4.8%，一百个人考只有 4.8 个人能够考取，竞争当然很厉害。但是我记得当年的高考题目，好像比今天的题目还要活一些，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是靠你积累的一些本领去考。现在的高考题，说实在话，越来越死，用我们的话就是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你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分析。

这样一个应试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用我们做老师的话来说，只不过是检阅一个学生有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题，考的是你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能力。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力，但是这不是我们高考，乃至中考，或者各种考



试所鼓励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大学生进入大学，理科我不清楚，从文科来说，我是教大学历史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消磁，把你中学里学到的一些已经被曲解的知识，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先告诉你这是不对的，然后告诉你新的东西，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消磁，让他们从应试头脑转变为创造力、有发散性思维的人，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上上下下从教育部到家长到老师，都在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都说要提倡素质教育。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种考法是不合理的，没有人说它好，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都说是素质教育，有人给胡锦涛写信说要改变这样的情况，要搞素质教育，胡锦涛同志还批示了，但是这股应试教育的势头刹不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延续下去？人人如果都觉得荒谬，大家都同意改，为什么还能够延续？这是一个曾经也让我非常费解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样各种的报道宣传，这个荒谬的确到了非常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抢状元情况，状元不得了，就像过去的科举一样，每年高考媒体抢新闻，状元永远是新闻，一个县出了多少状元，一个中学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现在状元基本上都被清华、北大两家学校瓜分了。前一阵子南方周末还有一个报道，说北大的一个专门去抢状元的招考老师，怎么和清华较量，怎么到地方上到一个省去抢状元，提前两天考生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拿到全省高考文理科前 50 名的名单了，然后打电话，还有提出优惠条件，清华也提出各种优惠条件，那个孩子开始还非常高兴，接下来就被无穷的人包围，他也六神无主了，不知道要去北大还是清华，因为他们都给了他们各种各样不同的承诺，还有搞什么状元碑的，等等。状元真的这么重要吗？状元真的就是天才吗？实际上我们如果看科举制度中的状元，有多少状元最后成为大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的？很少，清末的状元张謇最后也是当了实业家。历史上很多状元，可能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研究，这么多年来这些状元去那里了，出名了吗？成才了吗？没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是高考时的效应，中国今天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就象体育比赛中的冠军。状元和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实际上你们想一想，状元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换一张卷子，难度是一样的，再考一遍，我相信大概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的排列会有一个变化，他未必就像刘翔一样绝对可以拿冠军，我可以说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不是他把握的，也和批卷老师的把握也有关系，凭什么你的作文我多给两分，他的作文我少给两分，这是有偶然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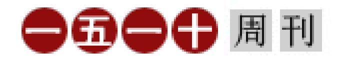
前一阵子我很偶然看到凤凰台鲁豫访谈，请了几个清华、北大的状元来，我觉得这些状元未必比我的学生优秀到那里。举一个例子，出了一个题目让他们设计一个慈善活动，说你们看一看怎么来策划。结果他们的策划是这样的，第一个策划是什么叫慈善，第二个是为什么做慈善，第三个如

何搞慈善。这种思考的方式，不就是考试中所谓一个论述题的思考模式吗？没有任何的创新，就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状元的情况，应试教育下的一些宝塔尖上的所谓人才。当然这些人绝顶聪明，我不否认，但是社会鼓励应试教育，今天我们的人才等级按照分数衡量，而且今天中国的大学、名牌大学，也有一个等级性的制度，顶尖的是两个超一流的大学，清华、北大，接下来若干所所谓的名校，接下来重点大学等等一层层的。你们可以看到报考时最优秀的通常是报北大、清华的，然后一层一层，没有例外的，没有按照孩子的兴趣来进行选择。这是形成高校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是谁规定的？可以说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国家的 985 资助计划，清华、北大 18 个亿，接下来是复旦、南大、交大等等，12 个亿，再接下来 6 个亿，再接下来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等级。

当然媒体各种各样的宣传，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高考指南，都助长了这样的情况。我自己是大学里的人，今天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个性，大家都想学清华、北大，不是学它个性面，而是共性面，今天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千人一面。考生对大学只是有一个模糊的等级概念，它是顶尖、是名牌的，但是对这所大学的风格、氛围，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自己是不是喜欢，那是不考虑的。过去中国的大学是有自己个性的，有自己风格的，很多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性格来进行选择，但是今天这个空间没有了。你可以考清华、北大，为什么要去报中山大学呢？中学老师可能就会给你压力，你是一所名校，有多少人可以考入清华、北大，这是一个指标，也是今后招生的一个宣传。

今天中国的大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他们没有这样的等级，没有说美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都是考哈佛或者耶鲁的，不是这样的。哈佛、耶鲁这种所谓顶尖的，为考生首选的大学，不是一两所，可以说起码有二十所，甚至更多，因为那些顶尖大学各有各的特色。在中国觉得哈佛不得了，但是很多美国学生，哈佛当然是好的，但是未必是大家公认最好的，最好的大学会有耶鲁，会有哈佛的邻居 MIT，麻省理工学院，还有加州理工学院，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甚至还有一大批最优秀的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大学，然后去选择了一些学院，文理学院。比如说美国有几个小的学校，非常非常出名，很多学生都愿意放弃哈佛的录取去这些小学院，比如说费城附近的斯沃斯莫学院等等，还有美国的威斯利女子学院等等，这些私立学校的学费比哈佛都高，为什么美国很多高中生不愿意去哈佛、耶鲁，而愿意去中国看来非常小的学院呢？因为在哈佛、耶鲁，大牌教授是很少上本科的，即使授课也是给几百人开讲座，等于听一个讲座，听不到精致的教育。而小的学院，一二十人的小班，完全是贵族教育，而且教师非常非常优秀，出来以后社会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如果报考研究生的话他照样可以考哈佛和耶鲁。





美国也是有排行榜的，但是把这两种是分开的，大学有大学的排行榜，学院有学院的排行榜，这两个排行榜是分立的，有非常多元的选择。但是在中国今天只有一个选择，唯一的标准。这又加强了我们所说的应试化，当然这几年香港大学等来中国内地招生，把这个局面打破了，用一个人的话来说"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当然这是夸大其词了。我在香港大学工作过一年，我并不认为港大、中大就比中国大陆的学校好，我自己认为是各有千秋吧。

简单来比较，香港的大学管理一流、教师二流、学生三流，清华、北大是学生一流、教师二流、管理三流。这是我自己在两边观察的结果，我也曾经写过文章。这些都是好事情，一个多元的大学，让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选择，这是最好的。港大来了之后，第一年招生，05 年就出了一个大新闻，他们内地 250 个招生指标里，有 11 个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拒收，因为面试下来这些人不行，只是一个考试机器，按照他们港大的招生方式，不是一对一的，几个人一组讨论问题，那好了，这些状元表达不行、知识狭窄，英语考的很高分，但是听不懂讲不出，对不起，港大说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状元，那些顶尖的人才，按照国外的标准来看未必是最优秀的，他们看重的倒不是宝塔尖的这些人，倒是在名校里水准在中上游的，反而有不少优秀的人。前年也是一个媒体，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一位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叫汤玫捷，提前录取意味着什么呢？哈佛提前在正常录取之外，它觉得你是人杰啊，提前几个月把你抢到手，许诺你高额的奖学金，你不用再考虑录取其他的学校了。这一年亚洲只有两个名额，中国一个。这个女孩子按照她在学校考试排分，是在百名开外，绝对进不了清华、北大的，但是复旦说这个成绩也绝对可以进入复旦，但是哈佛看中她的，不是她的成绩，而是她的能力，她做过学生会主席，有非常开阔的阅读视野，有非常好的领袖风格。哈佛就是培养领袖，它是看重你这些能力，不是你的考试，考试是一个参照而已。汤玫捷的英语非常好，因为她在美国著名高中交流过一年，在美国的高中生中她也是优异的。哈佛果然没有看花眼，汤玫捷到了哈佛之后，我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哈佛学生个个都是人精，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将来担当天下的领袖，汤玫捷到哈佛之后，照样是哈佛学生当中的领袖，她在大一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活动，去拉赞助，做了一个关于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这个峰会是在上海浦东开的，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当然她以哈佛的名义拿赞助是比较容易，但是一般也是拉不到，她作为会议的组织者，这个会很成功在上海召开。

国外的标准不是应试的，但是中国今天越来越应试化。我们可以发现，高考从它的下游来说，决定了中考，乃至于小学，现在著名的幼儿园、著名的小学入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从上游来说，现在影响到研究生考试。去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方案，数学历史等三门学科试点，开始全国统



一考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各国也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有一个担心，考研高考化，果然不是狼来了，是真的来了。今年会不会继续推出？不知道。但是这个考试推出以后进入的研究生水准一下子就落了一截，很多学生只会背，就是高考上来的，只会背基础的东西，考试的题目和高考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全是客观题，没有主观题，没有主观发挥的空间。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说公务员考试，都是一个模式，这不是一个高考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一个核心标准的问题，很荒谬，没有说它好，就它的内容来说。

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前不久杨东平，北京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有一个调查，民意调查，来问我对高考制度的看法。出来的数据很有意思，50%多的人对现在高考的内容是不满意的，但是 70%多的人认为这套制度还得继续下去，因为它还是公正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高考制度，就它的考试内容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荒谬，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今天还是公正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底层、内地的农村这些人一个希望，也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这批人，老百姓也就算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就是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特别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就是需要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

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隋唐以后到宋科举制度整个完善，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它背后是有一些出身的因素，你是什么出身，从上层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五经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能够背熟，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

变命运，鲤鱼跳龙门。

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社会也是越来越腐败，特别是明，但是整个社会，你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和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的可能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或者是自己不行，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所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流动的可能性，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东西，你们说美国的这套招生很好，香港的很好，但是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搞腐败，还有商业精英，当然本来有钱就是坏，本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暴露大学老师为人师表的那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别人是有信用的，被社会普遍信任，觉得他是可靠的，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所谓客观化的、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

今天的高考，你们可以看到中国各种制度里，平心而论高考是最公正的制度，最少腐败的。现在管理越来越完善了，过去招生在录取的时候，还可以 1：1.2 去招生，里面还有花样，现在电脑录取，你招 100 学生，给你 105 个学生的名单过来，从高分到低分，如果你要录取后面这五个低分的，你要写出理由，越来越公正，这是电脑派位所形成的公正。虽然大家认为这套制度很荒谬，但是整个的运作非常好，剔除了很多人为的因素，老百姓放心，越是底层的人越放心。如果你要搞花样，每个大学只有 2%的机动名额，你可以搞特招生或者是关系生，但是只有 2%，绝大多数还是公正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面，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使命，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科大的校长是一个脑子非常清楚的人，他也知道中国的高考是很荒谬的，但是他说现在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公正的，他说我们中国科大也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的形式，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也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

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所以直接由中学校长的推荐，通常大学都持某种狐疑的态度，通常我们认为推荐生未必比考来的人更好。这就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信用的问题。

在国外没有这样的问题，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来的，让各个名校，著名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的，一旦哈佛发现你一年、两年学生都是一般化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那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合理的制度，哪怕你个人，大学校长、大学老师再有信用，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为各种各样你迫不得已的因素所左右，所以老百姓不放心。

今天的高考用我的话来说，这个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这就是今天的高考制度。各位朋友，我相信不少来自教育部门的，你们有好的主意吗？能够超越这些悖论性问题吗？希望一会儿在讨论环节，各位朋友能够提出一些想法。

我这两年作为大学老师，也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包括高考、包括大学教育种种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几年教育部门，整个社会在做各种探索，希望做一些改革的探索。比如说现在比较有影响的有这几个模式试点。一个是政法大学的模式，政法大学去年的招生，因为它是全国重点大学，全国招生，过去名额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比例摊下来的，现在他按照人口，这个省所在的人口来划比例，人口越多的大省招生名额越多，他说也许这样是更公正的。这是政法大学一个高考招生名额分配上的思路，试图改变现在各大名校在城市发达地区招生过大的问题，北大、清华在北京招的非常多，复旦、交大在上海本地的生源也是非常多，比例很高。这是一个探索。

还有就是上海复旦、交通大学开始的试点，开始学习国外，自主招生，复旦、交大每年四百到五百个名额，在上海地区考生里自主招生，简单来说，先要通过一个报名，通过一个笔试，当然比高考会难一点，笔试过一条线之后，按照 1：3 的比例，然后进行面试。面试的时候，比如说考复旦，你要经过各个不同的老师面试，走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可能有两三个老师坐在那里，随意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社会问题等等，然后给你打分，最后按照面试成绩来录取。这很有一点借鉴港大等学校的招生方式，本来今年要扩大，扩大到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没有批，还是复旦、交大在继续试点。

这些试点都是想看看除了高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理的高考方式可以来做的，前不久杨东平领衔的北京二十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民间高考改革的方案，也得到了教育部

的一些肯定，因为高考改革方案很多，但是这个方案媒体后来曝光之后，引起了一些注意。杨东平提出高考以后不必是一次了，可以是多次，两次甚至是多次，然后要把高中会考乃至中学的考试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来作为一个考量。改变现在学生一考定终身的情况，设计了很多具体的改革方案。

那些这些改革方案，我一会儿也会分析，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可以全面推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解决我刚才所说的这两种合理性的冲突问题。一种合理性就是人才至上，按照我们今天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选择人才，这个大家都承认，这是合理的。我们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实质的合理性，高考就是选拔人才。但是另外一种合理性，就是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这是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是唯一的，更重要就是使中国差异这么大的地区之间，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机会，平等的竞争。所以这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称它是形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两种合理性发生很大的冲撞，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制度都有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有冲突。当然国外也有这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比我们成熟，他们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美国当然不像中国这样，地区差异这么大，但是他们过去有阶层的差异，那也是很大的。他们的阶层差异还体现在种族的差异上，通常白人小孩的读书比较好，因为家庭的背景比较好，受教育也比较好。但是有色人种，黑人、拉美人等的小孩，因为是新移民，家庭比较贫困，通常考试中不占优势。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肯尼迪之所以伟大，在美国历史上是被认为最伟大的一个总统，排在前三名，很重要就是他推出了一个平权方案，鉴于现实的考量，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特别是种族不平等的存在，通过平权方案，强制性的国家推行，给那些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孩子教育上补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再好的中学一定不能是纯白人的，要吸收黑人和有色人种，再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一定要有比例，20%左右，是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这是强制推行的，国家法律规定。

过去白人清一色的很有名的贵族高中，国民警卫队护送这些黑人的小孩去读书，当时白人不许黑人小孩去读书，说他们是什么 3K 党，但是当时美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护送。但是现在美国如果由于种族原因排出其他黑人小孩读书的话，那你就完了，在美国种族问题上你不能发出任何极端的言论，否则就立马下台。但是现在美国出现很多反校歧视，很多白人去告，我考分比他高一大截，他能被哈佛录取，我不能被录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我被歧视了吗？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涉及到正义，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

六十年代美国执行这套制度时理论还没有出来，到了 1970 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哈佛大

学很著名的教授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经典，很少有一本书一出来就立马成为经典，成为经典的书要经过几十年才有可能，通常作者生前是看不到的，这本书一出来就成为了经典，经典到什么程度，这个老师是哲学系老师，哲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乃至各种各样的系，都把这本书作为经典，大学或者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甚至罗尔斯这本书发展成一个产业，研究这本书的每年全世界有几十篇博士论文，长盛不衰，为什么？这本书回答了正义是什么。大家都说社会是要公平的，怎么解决，两种合理性冲撞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的原则，自由是最高的原则，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接受的。核心的问题，他提出了第二条，就是差异原则。当然很复杂，这本书是天书，一般人很难看懂，非常非常艰深，逻辑推论非常严谨，也很复杂，涉及到教育问题上，罗尔斯有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个人不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他当然有非常复杂的一套论述。这第二条差异原则，现在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美国社会正义，我们刚才说的平权方案核心的理论，大家都认同。

现在这个问题，在美国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但是你们会发现，中国这个问题，现在缺乏像美国的条件。我们中国当然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你们会发现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方高考名额也分配的越多，越是贫困的地方倒反而越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当然，富裕地区也有富裕的理由，因为过去科举按照分配名额，也不是完全平均的，也是富裕地区很多，为什么多呢？他说富裕地区纳税多啊，那当然你名额应该给我多了。民国时代有庚子赔款，送了一大批留学生出去，当时庚子赔款不是各省平摊的，越是富裕的省份摊的越多，所以返回的名额也越多，你也不能说不合理，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按照差异原则的话，那显然需要给那些贫困的地方一定的补偿，给贫困的学生一定的补偿，这才是合理的。

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用制度太不发达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不说高考，我就讲每年的研究生奖学金的分配问题。过去是有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三万块钱。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那些是公费生那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那都

是富裕的，农村来的父母都是务农的，就是贫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未必是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也有钱不少的，很复杂，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很难。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现在我们几所重点大学开始没有公费自费，统统都是自费，通过奖学金返回。现在学生填写家庭收入，有些学生很老实说，每个月收入一千块，有一些学生就没有提，那你说我就给没有填的学生，不给老老实实填了一千块的学生吗？显然也不合理。但是在国外，非常明显，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那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现在中国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不清楚，富人的更不清楚，当官的就更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很难也不是说要一事不为，我个人认为要用多种方式进行试点，如果要按照完全的人才选择标准，我们可以说现在复旦和交大那种自主招生的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选择到大学所需要的思路开阔、领导能力比较强，以后有可能创新的人才。但是，这套模式如果全面推广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不公正。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的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我们过去给贫困的小孩资助，但是现在发现很复杂。现在民间很多贫困的基金会，内部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大家也不太信任，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做基金会，他说在西方的这些慈善基金会，通常管理费法定是 12%，有很好的基金会做到 8%，但是在中国现在暴露出来，很多慈善基金会管理成本达到了 60-70%，你敢捐款给他们吗？不敢。然后又要献出爱心怎么办，中国现在凡是组织化的都很难信任，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个人，现在我们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到云南贫困县支教一年，我们通过他们可以放心，那些老师是比较善良的，钱可以直接到资助人的手里。但是即使这样我后来也发现很多困境，比如说是资助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呢？如果选择高中生，高中生可能最有可能成才，但是他们告诉我，凡是能够读到高中的人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贫困地区一年高中学费是 1600，这对贫困地区是天文数字，再加上每年一千块钱的生活费。还是能够咬咬牙读到高中的话，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最穷的是那些初中的，很多因为家里贫困，但是读书读的好，应该资助初中生，但是初中生到底有多少能够成才，不知道的。所以你选择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很让我们愿意献出爱心的人为难。这背后很重要的还是信用问题，整个信用体系不发达。

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是无法推广的，而

且考试科目越简单，越是对贫困生有利。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非常清楚，1905 年科举废除之后，实际上后来搞的新式教育，学的声光化电等，到了民国年间使社会流动远远不及过去的科举，因为过去的科举考的太简单了，四书嘛，很简单几本书，还可以买得起。但是民国搞新式教育，教科书太多了，还要到城市里读书，城市里的成本又高，几个贫家的子弟读得起？读不起。而且农村过去有家族，只要发现一个读书的种子，举全家族的力去支持，因为一旦他升官发财，那是整个家族得益的。今天农村的家族已经崩溃了，一个一个小家庭，亲戚们也很势力，谁知道你今后能不能成才，成才以后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了。

你们可以看到越是搞新式的素质教育，贫困子弟越是吃亏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补偿，他们越是在社会里处于下风。复旦大学面试也会问到炒股票的问题，如果在贫困地方，可能小孩子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所以这套好的东西，来到中国，就可能发生问题。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高考的坏话，但是如果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它还真的是唯一的，怎么办？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复旦、交大的方案可以继续试点，而且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继续扩大，但是以自主招生、以素质教育为选择人才的方式比例不宜太大，无论如何不能超过 1/4，因为我们还要向社会其他地区开放，给他们一种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试点是有意义的。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长官意志拍板了，一刀切，但是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谨慎推广，但是因为是长官意志他们说了算，通常是小心实验大胆推广，推广很快试点没有多少，到处是一刀切，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多元，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差异进行试点。各个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自主，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试点，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解决，来看看能不能解决如今被打紧了的高考死结，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像美国关于正义问题的大理论，不是理论层面的有效，而是针对目前中国具体的情况，我们社会不公正，能解决具体情况的。罗尔斯是针对美国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在根本上解决我们什么是正义、怎么安排，我们如果也有差异原则的话，我们是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背后要有论证。但是今天中国，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局部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放到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你怎么解决。大视野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冲撞，中国今天一方面实践有问题，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缺乏自觉的理论，这个东西没有，不能让社会的人心服从，今天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很多问题，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今天的中国，我一直说，中国社会问题表面上是在制度、在法律，但是实际

上根本问题制度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没有公共文化，制度，再好的制度也不行。

我想中国现在的法律，各种各样的法，多如牛毛，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如果纯粹看法，中国很多法还真的是不错，全世界从纯粹法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中国这些法形同虚设，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有另外一套，吴思先生也来讲过，有一套"潜规则"，没有一套相应的公共文化，更重要的就是社会没有一套大家公认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什么，现在没有，根本没有。前天我跟学生上课，我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在讲儒家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我就说中国今天说和谐，和谐是儒家的理念，造成一个和谐的文化秩序。但是儒家孔子说的礼，那个和谐社会，按照孔子的原意，不是指由政治强权，或者法律来强行保障推行的一个和谐，它是一个文化，礼背后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仁，它背后是一套价值，所以它才可以通过文化，通过人们道德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来服从这个礼，才能和谐。今天这背后核心价值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有人要说清楚，但是未必是得到都统一的。

同样正义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理论上一片空白，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制度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从对策思路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背后一层一层剥下去看，和社会各个环节都有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才能解决。今天提了很多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恐怕没有什么太完美的方案，所谓一揽子解决，一步到位的，很难，各种支持性的条件现在还是很弱，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但是耐心并不意味着忍耐，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实践的层面、对策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探索。

很抱歉，本来我是讲一个半时，讲着讲着超时了，耽误你们的提问和发言的时间。谢谢。

（许纪霖,学者, 致力于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互联网：新浪微博和谷歌

日本媒体 NHK 在新浪微博的官方账号@日本放送协会 NHK 6 月 1 日下午被运营商指因违反相关规定而禁言，随后关联帐号@Domo 君也被禁言。但是他们仍可上传图片，因此他们上传了多张照片告知外界被禁言的消息，其中一张写道"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纳尼"，似乎表示了对于被禁言的不满。
新闻：http://cn.fmnnow.com/?p=6241

由于中国大陆网友使用谷歌搜索服务时，经常遇到与谷歌服务器被中断的情况，而导致无法使用搜索服务，因此谷歌通过宣布，他们将向用户提示敏感词，以改善这一情况。用户可以尝试修改输入，选择其他或许不被阻断的字词。谷歌还表示，这种服务的不稳定不是谷歌的技术所造成的。
新闻：http://fmn.cc/LbXWvH

之后，谷歌由向部分用户邮箱提示警告信息，内容是：我们相信政府资助的攻击者可能正在尝试入侵你的账户或电脑。这在周三凌晨引起推特(Twitter)上一些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讨论。他们表示已收到警告。谷歌工程师表示，警告信息并不意味着用户账户已被劫持，而是为了加强疑似目标账户的安全。
新闻：http://fmn.cc/LmA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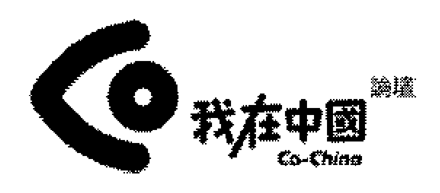
近日，在温州瑞安仙降街道发生聚集事件后，瑞安一网民林某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9 日。这名网民因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称：政府在早上打死了两个人。而被警方拘留。警方表示没有人员伤亡。
新闻：http://fmn.cc/LbYIZV

新疆一名叫"帕米尔•亚森"的网民，因通过新浪微博发布"维（吾尔）少年学习古兰经被扣在拘留所离奇死亡"等信息，被警方认定是散布捏造歪曲事实的信息和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扰乱社会秩序，因此被处以十五日行政拘留。
新闻：http://fmn.cc/MaJMgs

中美关于 PM2.5 的争论

上海市环保局 6 月 1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上海 PM2.5(大气细颗粒物)硬件设备安装已在 5 月底完成，6 月份将进行调试，具体发布日期还在研究。同时对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5 月份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上海 PM2.5 值的做法，局长称，美领馆向公众发布 PM2.5 值不合法。
新闻：http://fmn.cc/KQE5TH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这天，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驻华使领馆开展对



我国 PM2.5 监测并且发布数据，做在技术上既不符合国际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的要求，既不严谨，也不规范。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
新闻：http://fmn.cc/LjLUm5

同一天，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的 32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达到 89%，但执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后，细颗粒物 PM2.5 污染逐步凸显。且试点监测结果表明，多数城市细颗粒物超标，均值是 58 微克/立方米。
新闻：http://fmn.cc/KbQfDY

对于中国环保部的责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表示，发布空气污染报告没有干涉中国内政，也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就停止发布数据。他指出这是为美国人提供的服务，包括那些在大使馆社区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中国也发布美国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美国不会反对。
新闻：http://fmn.cc/MgKEwF

6 月 6 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方发言人再次重审希望美国停止监测并发布中国的环境质量数据的做法，称此举违反了中国有关环境监测的法律法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监测美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做法，发言人称“我们没有这个兴趣。”
新闻：http://fmn.cc/KEIpZ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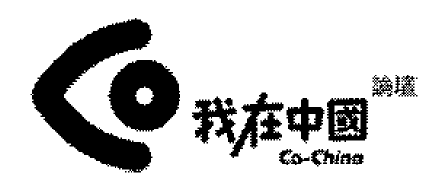
疾病控制：禽流感和艾滋病

一名两岁男童 5 月底在广东省开始发烧及流鼻水，出现症状后三日后到香港，并于旺角一间私家诊所求医。随后男童出现抽筋的情况，到医院化验时发现其咽喉分泌物中有 H5 禽流感病毒。目前香港和广东卫生部门都在密切跟进这一事件。
新闻：http://fmn.cc/JBJhbG

6 月 1 日，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芦阳镇东关村某养鸡场鸡只出现疑似禽流感症状，发病 6200 只，死亡 260 只。5 日被确诊为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当地现已对病鸡及同群鸡 18460 只全部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新闻：http://fmn.cc/NL0K4T

据安徽省政府制定的目标，该省表示到 2015 年底实现艾滋病新发感染数比 2010 年减少 25%，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控制在一万人左右，高危行为人群聚集场所有效干预措施的覆盖率达到 90%以上，接受艾滋病检测并且知晓检测结果的比例达到 70%以上。
新闻：http://fmn.cc/MmemGR

5 月 14 日开始，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二中发生肺结核疫情，截至目前，累计共发现结核病人 29 例，其中学生 26 例、教师 3 例。当地正在全力医治患者。
新闻：http://fmn.cc/NL0jaR



中国教育

高考将至，6 月 5 日上午在六安市毛坦厂中学统一编队的首批 52 辆大巴车，载着近 3000 名高考考生浩浩荡荡地从校园出发，赶往几十公里外的六安城区。现场挤满了前来送考的家长及亲友勉励考生，还有近千辆私家车也参与了送考。
新闻：http://fmn.cc/LmFsw0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近日表示，“近 30 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他说，现在的大学都是以给学生输送知识为主。其实，真正优秀的人，首先应该有想象力。有想象力，才会创新；其次应该有很强的洞察力，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最后应该有很好的记忆力。
新闻：http://fmn.cc/Kb3ZVU

教育部网站发布本年度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的，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入党意愿持续高涨，近八成的学生表示有入党愿望，与近年来的比例基本持平。将“追求理想信念”作为入党动机的学生比例比 2011 年高出 8.3 个百分点，连续 3 年排在入党动机的首位
新闻：http://fmn.cc/KsqNA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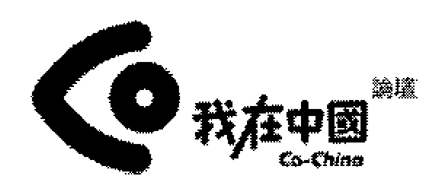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2012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近 4 年全国高考人数下降 140 万，高考中“三放弃”，即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现象日趋普遍。与之相对，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 20%的增长。
新闻：http://fmn.cc/LmFUL1
http://fmn.cc/LmG7h2

近日，杭州“实习护士虐待新生婴儿”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网友普遍持谴责态度，该实习护士肖诗雨所在的浙江中医药大学 6 月 3 日做出通报，已责令其停止实习，并作出深刻检查，外界普遍认为此事严重损害了公众对医疗行业信任。
新闻：http://fmn.cc/Lf96Oj

北京、江西、广东多地发生儿童遭受家庭暴力致死的案件，有调查报告显示，生活地点、父母结构发生变化的家庭更易发生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53.34%的案件发生在此类家庭中。相较于稳定、健全的家庭，单亲、继亲家庭以及流动、留守儿童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专家则表示，民警往往只对家长进行教育，孩子仍然会被送回家中，继续遭受家庭暴力。
新闻：http://fmn.cc/MaKavz

其他重点新闻

近日，一位中国公司女子去希腊度假，却在当地被偷走所有现金及银行卡。但在找到大使馆时，她并没有得到任何救助。最后，经过在酒店发微博求助，某公司希腊办事处人员给她送去了救急款。此事件中，中国使馆的冷漠态度和事后的解释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新闻：http://fmn.cc/NgAP4Z



http://fmn.cc/NgQvoT

今年 2 月因在武汉丢自行车而引发热议的日本人河原近日接受媒体访问，他直言中国人显然对外国人特别好，并希望中国人对彼此更好一些。他也表示可能因为中国人好面子的特点、以及众多朋友的帮助下才能如此快的找回自行车。
新闻：http://fmn.cc/KY6GTT

香港非政府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以下简称“SACOM”) 对 170 名员工进行了采访，随后他们发布报告称，富士康仍存在一些违规行为，如制定过高的生产目标，粗暴对待员工，以及削减工资等，工厂管理人员仍对工人施加让人感到屈辱的纪律措施。调查结果显示，苹果和富士康并未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新答卷。”
新闻：http://fmn.cc/LcbK9K

6 月 2 日上午，上海松江居民和高校学生聚集到松江万达，抗议将在附近建造的焚化厂，要求政府取消这一规划项目，人们手举写有反对意见的纸张，大部分人戴了口罩，象征焚化厂会产生二噁英，人类吸入后会引发严重疾病。而且焚化厂周围遍布居民区、高校，一旦建成影响范围十分广泛。
新闻：http://fmn.cc/JBJfAu

一百名作家有偿的手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热议，作家出版社表示，他们联系了一百二十多个人，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另一些，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就很委婉地拒绝。目前，这本手抄“讲话”一书最后定价为 280 元。
新闻：http://fmn.cc/KQKzC0

据云南网报道，5 月 31 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接受了罗正富、曹建方辞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外界有猜测称可能他们的辞职同今年薄熙来到云南视察时，由他们二人陪同有关。
新闻：http://fmn.cc/KZZOsi

6 月 6 日上午，网友得到消息指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死亡，由于家属表示李旺阳非正常死亡，警方又控制了李的尸体并禁止家属拍照，而且威胁闹事者将被抓。同时还有网友公布了李旺阳死亡时的照片，其中的疑点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和关注。人们更发起联署活动要求真相，数千网友已签名参加。
新闻：http://fmn.cc/L4xGEw
http://fmn.cc/L4y71L

年仅 20 岁的滑翔伞飞行员杨小强 6 月 4 日练习时意外身亡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体育总局一位负责人对外表示，因杨小强是临时选上，没有编制，此次意外不能按照工伤处理。 5 日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5 日发表一份《说明》，讲述了杨小强遇难的经过，并表示了哀悼。
新闻：http://fmn.cc/KNa9JE
http://fmn.cc/KNaegu

中海油和康菲 4 日晚发布公告称，2012 年 6 月 3 日晚 11 点 08 分，位于渤海湾的蓬莱 19-3 油田在一次常规的原油外输作业中，输油软管上的一个连接阀断开，导致 0.6 立方米原油（约 3.8 桶原油）溢出。分析指出，再次漏油的事件可能会导致该油田复产推迟。一年前的同期，该油田因大范

围漏油对渤海的环境造成污染，并给渔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新闻：http://fmn.cc/NHJvl3

6 月 5 日，人社部就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集中答复网友时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该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新闻：http://fmn.cc/KDtw9y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u/2763005200#1335374360026）

编辑：童亚琦 黄雯怡 刘垚

校订：丁昕

主编：丁昕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简兆明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